

温州史志

2015年第1期
(总第110期)

■ 专 稿

- 3 陈一新同志在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9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 5 金延锋同志在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9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 改革开放实录

- 8 1978—2012年温州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温州市统计局
- 18 风雨历程三十载 与时俱进谱新篇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回眸》正泰集团公司典型案例材料
林可夫

■ 党史资政

- 21 温州特色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路径探讨 李岳松

■ 史志研究

- 26 试论“温独支”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刘金君
- 30 温州“大跃进”失误与国民经济调整 陈启中

目录 contents

40 《沙城镇志》出版及文化积极作用 张声和

42 志书编写流程与注意事项 陈建敏

■ 岁月回眸

47 记离休干部李东明同志的一些往事 柯永波

52 我为石垟老区办两件实事 林宝昌 口述 梅明 整理

■ 历史人文

55 永嘉古道现状 高远

62 蛮话的源头在哪里

——兼与《蛮话方言史》著者商榷 朱林敏

封底篆刻 蓝 潮



2015年第1期
(总第110期)

主办单位: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温州史志》编委会:

主 任: 赵降英

副主任: 赵万磊 魏仕阔 张声和
陈建中

委 员: 曾娟青 张 林 毛少甫
郭东升 张林洁 厉 靖
陈 好

主 编: 赵降英

执行主编: 赵万磊

副主编: 陈 静

校 对: 杨建明

地 址: 温州市行政管理中心

电 话: 88969623

传 真: 88968777

E-mail: chenj@zjds.org.cn

邮政编码: 325009

出版日期: 2015年3月

刊 号: 浙内准字第C044号

印 刷: 温州市北大印务有限公司

陈一新同志在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9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4年12月16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90周年纪念会，重温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进一步凝聚起温州赶超发展正能量。在此，我代表市四套班子，向为温州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先烈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怀念！向所有为温州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的老前辈、老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历史，是一部艰难而又辉煌、光荣而又伟大的历史。1924年12月，浙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在城区新民小学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后，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拉开了浙南革命

斗争的伟大序幕。但是，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温州独立支部遭到了严重破坏，其创始人谢文锦及重要成员先后被捕、壮烈牺牲，部分党员被迫转入农村坚持斗争，后来有不少党员成为红十三军和浙南特委及所属党组织的骨干。

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国民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在浙南大地广泛播下了革命火种，为浙南中共党组织的重建和革命斗争的胜利奠定了扎实基础，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革命先烈和浙南革命儿女，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展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牺牲精神，其丰功伟绩永载史册！

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纪念中共温州

独立支部成立90周年，最重要的就是要用革命传统和革命事迹教育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肩负使命，以推动温州“赶超发展、再创辉煌”为己任，切实把先辈未竟的事业进行下去，把先辈开创的基业发扬光大。

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必须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总开关”。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革命先烈历经艰险、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斗争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了，环境变化了，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没有变，也不能变。我们一定要向革命先烈学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始终做到精神富有不缺“钙”。

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革命先烈把自己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甘苦、共命运，形成了血肉相联的党群干群关系。当前，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主旨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改进作风、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我们一定要向革命先烈学习，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誓言，以巩固和扩大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为途径，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根植于思想和行动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

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必须始终强化敢于担当。敢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党性要求和品质所系。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革命先烈面对血雨腥风毫不畏惧，面对艰难险阻一往无前，彰显出了难能可贵的担当精神。近些年来，温州发展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破难攻坚、推动赶超发展，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敢于担当、有所作为。我们一定要向革命先烈学习，敢于克难担当，进一步焕发出顽强拼搏、真抓实干的精气神，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努力开创新常态下温州赶超发展的新局面。

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做好老干部工作。老同志为我国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革命先烈的浴血奋战，没有老同志打下的坚实发展基础，就没有温州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牢记，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党的光荣历史，爱护老同志就是爱护党的宝贵财富，重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就是重视党的执政经验和执政资源。各级各部门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老干部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切实做好新形势下老干部工作。

同志们，回顾峥嵘岁月，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展望美好前景，我们充满必胜信心。我们一定要以纪念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90周年为契机，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切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去迎接新挑战、夺取新胜利，为温州“赶超发展、再创辉煌”而努力奋斗！

金延锋同志在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9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4年12月16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同志，各位来宾，同志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90周年。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对活动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前来参加此次纪念活动的各位领导、老同志、来宾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向一直以来始终指导、关心和支持党史工作的温州市委、市政府及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温州，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温州人民就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党组织在温州地区的建立奠定了思想条件和社会基础。1924年8月，中共中央派温州籍共产党员谢文锦回到家乡宣传马列主义，筹建

党团组织。12月，直属党中央的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在城区新民小学成立。这是浙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党组织。“温独支”建立以后，宣传马列主义，积极建党建团，实现地方国共合作，唤起民众，广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温独支”遭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全部被取缔。“温独支”的创始人谢文锦和主要成员郑恻尘分别在南京、杭州遭杀害。部分“温独支”成员转入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其中多数同志成为1930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和中共浙南特委的领导骨干，为浙南大地留下了革命的火种。此后，浙南人民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断积蓄与壮大革命力量，终于在1949年5月解放了温州及浙南全境，胜利地完成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可以说，“温独支”点燃了浙南地区的革命之火，揭开了浙南历史崭新的一页。

在“温独支”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回顾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对于我们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入开展党史研究，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励志图强，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纪念“温独支”成立90周年，就是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为建设“两美”浙江、“两富”浙江而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崇高的理想信念，是我们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有了理想信念，就能站得高、看得远，就能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革命先烈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毫不退缩，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就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温独支”创建人谢文锦曾说过：“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总是有牺牲的。我们不怕牺牲，我们要组织力量和敌人对抗！”郑恻尘在狱中给妻子胡识因写信说：“为革命坐牢牺牲是常有的事，你不要难过。”他们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精神，深深地感动和鼓舞了周围的同志，激励后来人坚定理想信念，继承他们的遗志，实现了革命的胜利。今天，革命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远去，党员干部像战争年代那样面临生与死的抉择少了，但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理想信念依然十分重要。我们只有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站稳自己的立场，把握住事件的真理，时时处处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为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纪念“温独支”成立90周年，就是要进一步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始终不渝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谁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谁就能战无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温独支”成员就是通过访亲会友、召开座谈会、发表演讲等形式，深入学生、工人、农民中广泛宣传共产党主张，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很快打开工作局面的。今天，随着我们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必须解决好如何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这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广大党员干部要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我们纪念“温独支”成立90周年，就是要始终保持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斗志，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客观物质条件已经初步具备的前提下，对于成就一项事业来说，精神力量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温独支”及浙南的革命历史可见，革命能最终取得胜利，除了党的正确领导，群众的大力支持，更要靠压倒一切敌人、征服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气概。今天，我们面临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历史任务，更不能涣散革命意志、懈怠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把“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要求广大干部要有担当精神，面对已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要求大家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夏宝龙书记要求全省干部要做“狮

子型”干部，当“战士”，不当“绅士”。面对重任和考验，要勇于担当、冲锋在前；面对矛盾和问题，要知难而进、克难攻坚；面对困难和挑战，要不屈不挠、愈战愈勇。我们一定要认清使命、敢于胜利，树立坚定的信心，保持昂扬的斗志，在攻坚克难、破解难题、操作到位上下功夫，在迎接挑战、战胜挑战中把握机遇、乘势而上。

我们纪念“温独支”成立90周年，就是要认真学习宣传党的历史，在党史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党中央对党史学习教育和宣传工作历来十分重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有多处关于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的论述，比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领导干部学习党史，有助于提高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修养，有助于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对于年轻干部更需要比较系统地学习党的历史，接受生动具体的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强调要学习党史创造有利条件，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对党的历史的学习，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结合起来，努力形成学习党史、宣传党史和运用党史教育党员人民、促进工作的良好氛围。深刻阐明了学习党史在认识事物、明辨事理、把握未来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的一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学习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历史，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要学习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形成、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同志们，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得最多、并作出许多重大决策的地方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之一，又是世纪之交以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过或指导视察较多的地方之一，党史资源非常丰富。同样，温州也拥有丰富的党史资源，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都有许多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我们要进一步推动温州党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促进温州党史的学习宣传和教育，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最后，祝本次纪念活动圆满成功！祝愿温州的明天更美好！祝愿温州老区人民的生活更幸福！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改革 开放 实录

编者按：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史工作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按照全省第九次党史工作会议精神 and “一突出、两跟进”（进一步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即时跟进党中央的步伐，即时跟进历史前进的步伐）的工作要求，市委党史研究室将全面推进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有关温州历史的研究，以期更好地服务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切实发挥好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因此，本刊特开设“改革开放实录”专栏，主要刊登改革开放以来涉及温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相关文章。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积极踊跃投稿，届时择优录用，稿费从优。

1978—2012年 温州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 温州市统计局

温州经济发展史说到底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史，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带动了社会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发扬“特别能吃苦，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造就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典范之一。随着经济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温州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城市之一。

一、改革开放起步和快速发展时期（从1978年至1990年代初）

1978年全市^①生产总值13.2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5.57亿元、

4.74亿元、2.91亿元。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42.2：35.8：22.0。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238元。全年全额财政收入3471.30万元。

（一）综合实力快速提升。1990年全市生产总值77.90亿元，与1978年相比，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11.7%。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1.34亿元、34.80亿元、21.76亿元。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27.4：44.7：27.9，与1978年相比较，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比重迅速提高。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1174元，是1978年的4.9倍。全年全额财政收入88929万元，是1978年的25.6倍。

（二）乡镇工业、家庭工业异军突起。这一时期

温州民营经济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个体私营经济进入初创和早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家对温州的国有经济投入不足，在强调公有经济的政策背景下，以城镇和乡村集体工业为特征的集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11.12亿元，其中国有经济3.97亿元，占35.7%；集体经济6.13亿元，占55.1%；城乡个体经济0.0016亿元，占比近乎为0；其他经济1.02亿元，占9.2%。与全省同期比较，温州集体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8.9个百分点，这为温州民营经济的领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还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迫不得已戴上了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在发展民营经济的认识上有了新提法，特别是邓小平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各种经济成分”的思想观念突破，奠定了温州民营经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潮下兴起的基础。大批劳动力从耕地上转移出来，乡镇工业迅猛发展，涌现出成百上千个“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专业村、专业乡，形成了乐清柳市五金电器、永嘉桥头纽扣、苍南金乡标牌徽章塑卡、宜山再生纺织、平阳萧江编织袋、瑞安仙降塑革鞋等十大著名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1990年，温州市工业总产值95.07亿元，是1978年的8.5倍，年均递增19.6%。其中国有经济15.67亿元，占16.5%；集体经济48.33亿元，占50.8%；城乡个体经济7.85亿元，占8.3%；其他经济23.22亿元，占24.4%。据测算，1990年全市民营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已达到82.8%，比1978年提高18.5个百分点。

（三）农村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包产到户”的兴起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全市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1990年，全市农业总产值34.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与1978年相比较，年均增长9.5%。粮经结构有所调整，粮食作物产量有所减少，经济作物产量增加。1990年，全市粮食作物总产量141.34万

吨，比1978年减少16.77万吨；经济作物中，油料产量1.61万吨，比1978年增加0.46万吨，其中油菜籽产量1.56万吨，比1978年增加0.48万吨。农机拥有量得到大幅增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8.22亿瓦。其中小型拖拉机1.73万台，动力1.48亿瓦；机动打稻机2.94万台，动力0.56亿瓦；排灌用电动机0.78万台，动力0.37亿瓦；农用汽车833辆，动力0.59亿瓦。在农业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林业、牧业、渔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主要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1990年末，生猪存栏103.41万头，是1978年的8倍；牛年末存栏10.08万头，是1978年的11倍；羊年末存栏8.59万头，是1978年的10倍。水产品总产量18.49万吨，是1985年的1.2倍。1984年水产品产量303.16万担，是1978年的16倍。造林面积34.45万亩，是1978年的7.6倍。

（四）财政、基建、交通、邮电事业迅猛发展。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加。1990年，全市财政总收入88929万元，是1978年的25.6倍。随着财力的增加，政府主导型的基建及交通事业也得到迅猛发展。“六五”“七五”期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99.04亿元，是前十年的15.9倍。一大批民生类重点工程取得重大进展。瓯江翻水站、台临温22万伏和温永乐11万伏输变电工程、东屿电厂、瓯江大桥、温州电视台、状元煤码头、杨府山港区、飞云江大桥、楠溪江大桥、龙港鳌江大桥、温州机场、龙湾两个万吨级码头、港务局客运大桥、过境公路等建成投用。交通状况的改善也带动了货物运输量的快速增长。1990年全市货物运输量1985.72万吨，是1978年的8.8倍。其中公路运输1218.59万吨，是1978年的11.7倍。全年货物周转量35.45亿吨公里，是1978年的6.2倍。全年旅客运输量12704.71万人次，是1978年的3.2倍。旅客周转量41.89亿人公里，是1978年的18.6倍。邮电业务总量6122.2万元，是1978年的36.1倍。出口函件10763.1万件，是1978年的23.8倍。订销报纸累计份数3968.3万份，是1978年的663.6倍。

（五）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与人民生活

均有所提高。1990年，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104.16万人，是1978年的6.7倍。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41002人，其中专任教师35640人，分别是1978年的5.3倍和5.7倍，表明了生均享受到的教育资源有所增加。全市有电影放映单位612个，全年放映场数21.56万场，是1980年的5.3倍，观众人数9550万人次，是1980年的2.7倍。1990年末，全市有卫生事业机构961个，其中医院482个。床位10135张，其中医院床位数9762张。总床位数是1978年的1.7倍。卫生技术人员17434人，也是1978年的1.7倍。

这十年来，城乡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1980年，全年农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从集体经济基本核算单位分得的收入为114元、口粮560斤，分别比1978年增加29元、88斤。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735元，比1978年增加65元；集体所有制职工平均货币工资574元，比1978年增加117元。1990年，全部职工人均工资1989元（不包括乡办职工）。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人均工资2115元，是1980年的2.9倍；集体所有制职工人均工资1860元，是1980年的3.2倍。每百户城市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电视机109台，比1985年增加32台；洗衣机46台，增加42台。农民人均纯收入929元，比1985年增长1.1倍，年均递增4.2%。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电视机41台，比1985年增加34台；缝纫机55架，增加20架；自行车107辆，增加71辆。城乡居民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1990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用房面积8.54平方米，比1985年增加2.04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房面积21.38平方米，比1985年增加4.27平方米。

二、全面发展的十年黄金时期（从199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

199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是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十年黄金时期，凭借先发优势，这一时期温州人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社会事业也在经济的带动下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三次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1991—2001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9.6%，比上一时期平均高7.9个百分点。2000年全市生产总值822.0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53.21亿元、455.63亿元、313.18亿元。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由1990年的27.4：44.7：27.9，调整为6.5：55.4：38.1。表明了这一时期温州工业化进展迅速，二产和三产已成为全市经济工作的重心。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11276元，是1990年的9.6倍。全年财政总收入73.87亿元，是1990年的8.3倍。

（二）民营工业经济全面高速发展，“温州模式”闻名全国。这一时期是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十年黄金时期，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这一阶段温州民营经济前期以个体私营经济大发展为主要特征，后期以现代公司制发展为主要特征，而集体经济则逐渐萎缩。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坚定了进一步发展的信心。这一时期，温州形成了以“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为特色的经济格局。从邓小平“南巡讲话”至党的十五大召开期间，温州个私经济发展领先全国，备受各界关注。1997年，全市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5616家、个体工商户19.78万家。其中城乡个体工业户已达到9.58万家，比1990年增加7.31万家，比1980年增加9.45万家。199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1242.40亿元，其中个体工业总产值已达到433.23亿元，占比重34.9%，比1990年提高26.6个百分点。在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集体经济开始萎缩，1997年集体工业经济占全社会工业比重为22.5%，比1990年下降28.3个百分点。据测算，1997年全市民营工业总产值1148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92.4%，比1990年提高9.6个百分点。随着《公司法》在1994年7月出台，现代公司制在全市民营经济中得到逐步发展，1997年，全市工业领域的股份及股份合作制企业

已达到676家，实现工业总产值74.12亿元，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33.6%和18.1%。

1997年，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及随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温州民营经济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更为宽松，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更为突出。从党的十五大至21世纪初，公司制在民营经济中得到快速发展，2002年，在全市368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除国有、“三资”工业企业外，民营工业企业3295家。其中民营公司制企业2071家，实现工业总产值567.54亿元，分别占规上工业比重为56.2%和53.9%，比1997年提高22.6个和35.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个体工业户数量虽有所增加，但实现的工业总产值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2002年全市个体工业企业10.6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694.73亿元，占全部工业比重30.6%，比1997年下降4.3个百分点。集体工业经济不断改制，2002年全市集体工业产值仅占1.5%，比1997年下降近20个百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高增长，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八五”“九五”期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1364.43亿元，是前十年的13.8倍。其中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65.25亿元，是1990年的15倍，年均递增31.1%。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持续扩大。全年交通运输邮电业投资36.93亿元，是1990年的39.2倍，年均递增44.3%。电力投资26.47亿元，是1990年的18.7倍，年均递增34.0%。文教卫生体育广播和社会福利业投资9.6亿元，是1990年的20.2倍，年均递增35.1%。一批重点基础工程相继完成。220千伏瑞安变电所、110千伏双屿和龙东变电所、机场大道、车站大道、黎明东路、新城大道、牛山北路、市体育馆、医学院教学楼、东瓯大桥、瓯江五桥、广播电视大厦、国际贸易中心等建成投用。珊溪水利枢纽工程、甬台温、金丽温高速公路温州段、温州电厂二期等大型重点骨干工程进展顺利。

（四）国内商品市场繁荣，对外开放取得新成就。“八五”“九五”期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2263.99亿元，是前面十年的9.4倍。其中2000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7.91亿元，是1990年的9.1倍，年均递增24.7%。2000年末，全市有各类市场544个，其中消费品市场417个，生产资料市场114个，生产要素市场13个，商品交易市场总摊位10.02万个。全年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464.89亿元，其中成交额超亿元以上市场73个，年总成交额344.88亿元；超十亿元市场8个，年总成交额185.02亿元。

2000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0.15亿美元，其中出口15亿美元，分别是1990年的130倍、164倍，年均递增62.7%、66.5%。2000年批准自营出口权企业115家，年末累计323家，经营主体多元化趋向逐步形成。全年国有企业出口8.04亿美元，“三资”企业出口3.71亿美元，有出口经营权的集体和个体企业出口3.15亿美元，年均均有大幅增长。出口商品中，服装、鞋类、机电、灯具、打火机（眼镜）分别占比17.2%、21.1%、36.3%、10.6%和6.8%。出口市场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北美洲、非洲，出口额分别占45.1%、30.8%、10.3%和7.5%。“九五”时期全市实际利用外资3.04亿美元，分别是“八五”“七五”时期的1.35倍和28.66倍。其中，2000年实际利用外资7202万美元，是1990年的29倍。

（五）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进一步提升。教育事业有所提高。2000年末全市各类学校在校学生118.58万人，比1990年增长13.8%。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16.1%，比1990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全市有普通高校6所，比1990年增加3所，年末在校学生1.54万人，是1990年的3.7倍。普通中学在校学生44.52万人，是1990年的1.5倍；小学在校学生66.02万人，比1990年减少6.94万人。义务教育人口入学率99.6%，比1990年提高0.9个百分点；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比例34.3%，比1990年提高6.6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3.1%。

文化事业活跃繁荣。2000年，全市有艺术表演团体10个、文化馆12个、文化站321个、公共图书馆12个。艺术团体演出1366场，观众212.9万人次；公共图书馆藏书184.19万册（件），年总流通267.6万人次。广播电视以网络建设为重点，实施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提高了综合覆盖率。2000年，全市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4.8%，比1990年提高3.8个百分点；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6.1%，比1990年提高10.9个百分点。

卫生事业稳步发展。2000年，全市有卫生机构782个，其中医院57家、卫生院510家；医疗单位病床床位12411张，比1990年增加2276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23515人，其中医生9111人，分别比1990年增加6081人和2223人。每万人平均拥有病床16.9张、医生13.5人。各级医院、卫生院全年诊疗1277.8万人次。全市个体开业诊所3211人。农村初级保健继续改善，全市已有112个乡镇达到或基本达到初保规划要求，占乡镇总数39.2%，已有116.75万人口参加农村合作医疗。

（六）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改善。2000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11229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051元，比上年增长16.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298元，比上年增长6.8%，增幅均比上年提高。“九五”期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年均递增12.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递增8.1%。年末城市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0.2平方米，比1990年增加11.66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33.7平方米，比1990年增加12.32平方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64.15亿，是1990年的14.9倍。

三、先发优势逐步弱化时期（从2000年代初至2012年）

2000年代初至2012年，温州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与问题，整体国民经济在转型升级中实现平稳增长，社会各项事业得到稳步推进。但从省内11个城市横向比较看，这一时期温州的发展相对缓慢，

属于先发优势逐步弱化期。

（一）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位回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002—2012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4%，比上一时期平均低8.2个百分点。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3669.1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14.22亿元、1852.98亿元、1701.98亿元。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由2000年的6.5:55.4:38.1调整为3.1:50.5:46.4。从一产比重相对进一步缩小、三产比重相对进一步提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我市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表明整个经济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5906元，是2000年的4.1倍。全年财政总收入517.89亿元，是1990年的7倍。

从前后两个时期对比看，2002—2012年，全国GDP年均增长10.3%，增幅比前期提升0.1个百分点；全省GDP年均增长11.9%，增幅比前期低2.7个百分点；而温州GDP年均增长11.4%，增幅比前期低8.2个百分点，比杭州、宁波、绍兴、台州多回落4.0、3.9、6.8和3.2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更加明显，民营经济对温州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呈现逐年减弱趋势。

表1：温州地区生产总值前后两个时期平均增速与兄弟城市及全省全国比较

	GDP (%)		
	1991—2001年	2002—2012年	提升幅度 (%)
全国	10.2	10.3	0.1
全省	14.6	11.9	-2.7
温州	19.6	11.4	-8.2
杭州	16.8	12.6	-4.2
宁波	16.5	12.2	-4.3
绍兴	13.6	12.2	-1.4
台州	16.9	11.9	-5.0

(二)农村经济总体平稳。2012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114.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与2000年相比,年均递增2.1%。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85.1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3%。其中,农业产值79.58亿元,同比增长2.9%;林业产值4.37亿元,同比增长6.4%;牧业产值38.99亿元,同比下降3.8%;渔业产值58.90亿元,同比增长2.1%;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3.27亿元,同比增长12.9%。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较大。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4.71万公顷,比2000年减少9万公顷。其中粮食播种面积15.66万公顷,比2000年减少9.17万公顷。全年粮食总产量为92.71万吨,比2000年减少32.76万吨。在经济作物中,油料作物2.11万吨,比2000年增加1.31万吨;茶叶4973吨,比2000年增加2287吨。

表2:2012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指标	产量(万吨)	比上年增长(%)
粮食	92.71	-0.4
水果	40.74	1.0
#园林水果	18.81	10.0
蔬菜	129.44	-4.0
糖料	2.33	8.9
茶叶	0.50	2.8
油料	2.11	2.7

肉类生产扩大,全年肉类总产量13.15万吨,比2000年增加3.05万吨。年末,生猪存栏85.36万头,比2000年增加7.96万头;家禽存栏1062.88万只,比2000年增加257.18万只。全年水产品总产量57.69万吨,比2000年减少3.41万吨,其中海洋捕捞44.81万吨,比2000年减少2.79万吨;海水养殖10.47万吨,比2000年减少0.73万吨;淡水产品2.40万吨,比2000年增加0.1万吨。

全年水利建设完成投资86.10亿元,年末拥有大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18座、小型水库287座。全市旱

涝保收田面积74.49千公顷,有效灌溉田面积126.95千公顷,其中机电排灌面积96.92千公顷。全市农(渔)业机械总动力233.14万千瓦,增长1.3%;农村用电量90.27亿千瓦时,增长0.5%。

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快推进。“两区建设”提质提速,全年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11.42万亩,建成主导产业示范区15个、特色农业精品园55个、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区10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有所加强,建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管理枢纽站3个、溯源点43个,新增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72个。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监测农产品合格率98.7%、畜产品合格率99.1%。基层农业服务体系得到健全,全市所有乡镇(街道)都组建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建成55个农业公共服务中心。

(三)民营工业经济先发优势逐步弱化。

1. 工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2012年,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6839.36亿元,是2000年的3.8倍,年均递增11.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290家,实现工业总产值4248.62亿元,其中轻工业产值1490.59亿元、重工业产值2758.03亿元。轻重工比从2000年的61.2:38.8转为35.1:64.9,表明工业发展重型化趋势明显。除国有、“三资”工业企业外,民营工业企业3986家,实现工业总产值3626.02亿元,分别占规上的92.9%和85.3%。

规模以上工业中,实现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1307.63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30.8%。按行业分,有12个大类行业产值超100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3472.76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81.7%,其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橡胶塑料制品业等6个大类行业年产值超过200亿元。

2. 与省内先进城市比较,工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及随后人大通过立法明

表3：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情况

指 标	单位数 (家)	工业总产值	
		实绩 (亿元)	比重 (%)
总计	4290	4248.62	100
国有企业	18	249.17	5.9
集体企业	12	15.46	0.4
股份合作制企业	165	73.39	1.7
有限责任公司	909	1047.19	24.6
股份有限公司	69	354.06	8.3
私营企业	2825	2128.20	50.1
“三资”企业	286	373.43	8.8
联营企业	3	3.17	0.1
其他企业	3	4.57	0.1

确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全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民营经济发展大环境迅速改善，各地民营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但温州民营经济比重在快速提升后趋向稳定，先发优势弱化明显。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本轮经济危机对温州的影响远甚于其他地方。1991—2001年，温州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4.2%，高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6.2个百分点，快于同期杭甬绍台四城市至少2个百分点以上。而2002—2012年，温州工业增加值年均仅增长11.3%，低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慢于同期杭甬绍台至少1个百分点以上。

（四）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近十年来，温州服务业发展相对于工业要快的多，全市服务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313.18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701.9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12.6%，高于同期GDP增速1.1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38.1%，提高到2012年的4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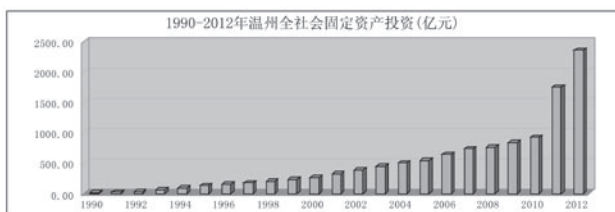
金融业、物流业、旅游业等服务业重点行业的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金融存贷规模迅速扩大。2012年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7425.62亿元、贷款余额6839.37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8.0倍、11.8倍，年均递增18.9%、22.8%。地方金融改革和创新继续深化。全年新增小额贷款公司26家，年末累计57家，其中已开业31家，注册资本金81.1亿元；年末，全市累计拥有村镇银行6家；境内外上市企业12家；已开业民间借贷服务中心4家；已开业民间资本管理公司6家。物流业发展较快。十年来，温州不断加大物流业发展力度，重点项目建设进程加快，物流园区建设进展顺利，物流载体培育效果显著。2012年全市货运总量达11916万吨，是2000年的2.2倍，年均递增6.6%。其中公路货运量8022万吨，是2000年的1.8倍，年均递增5.1%。港口货物吞吐量6997万吨，是2000年的6.3倍，年均递增16.5%。

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近年来，全市加快旅游强市建设步伐，做好“山上、海上、晚上”旅游文章，游客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连创佳绩。2012年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4944.1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84.3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8.6%和23.6%。其中接待国内游客4886.63万人次，是2000年的8.2倍，年均递增19.2%，国内旅游收入464.24亿元，是2000年的9.8倍，年均递增20.9%；接待海外游客57.54万人次，是2000年的9.6倍，年均递增20.7%，国际旅游外汇收入3.19亿美元，是2000年的9.2倍，年均递增20.3%。

（五）固定资产投资力度逐步加大。近十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全市投资力度不断加大，2002—2012年，全市累计投资5010.75亿元，是1991—2001年的5.8倍。尤其是近两年来，在“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战略的强有力推动下，扩大投资需求成效显著。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51.52亿元，比上年增长89.2%；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357.11亿元，在上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再次同比增长34.6%。2012年全市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2110.34亿元，比上年增长37.0%。其中工业投资、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为469.26亿元、627.81亿元、687.50亿元，分别占限上固定资产投资额的22.2%、29.7%和32.6%。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成效显著。2012年实际实施重点建设项目131个，完成投资401.15亿元，同比增长81.8%。其中新开工重点项目56个，完成投资额163.22亿元，主要有瓯飞工程、温州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市域铁路客运S1线（石坦隧道）、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乐清至瑞安段、温州市绕城高速公路西南线、大门大桥二期工程、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龙湾、瓯海、乐清、瑞安），等等。

（六）消费品市场平稳增长。十年来，随着温州经济不断发展、扩大内需政策效应拉动和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消费品市场规模迅速扩大。2012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29.29亿元，是2006年的4.8倍，年均递增14.1%。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增强。2012年全市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业共实现增加值490.93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13.4%，比2000年提高2.3个百分点。各类市场蓬勃发展。2012年末，全市有各类市场500个，其中消费品市场379个、生产资料市场92个、生产要素市场8个，网上市场19个、服务市场2个。全年各类市场成交额916.65亿元，是2000年的2倍，其中超亿元市场77个，年成交额778.00亿元；超十亿元市场23个，年成交额606.31亿元。消费结构升级进程加快。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继续向汽车、高档通讯器材、金银珠宝等享受发展型消费倾斜，2012年全市限额以上化妆品、汽车、金银珠宝、通讯器材等消费升级产品实现零售额366亿元，占限上比重

47.7%。

（七）对外经济总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近十年来，全市外经贸克服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影响，克难攻坚，波动前行，对外经济迈向列高层次。2002—2012年，全市进出口总额累计1303亿元，是1991—2001年的15.4倍。其中出口累计1083亿元，是1991—2001年的16.8倍。近两年来，受外围大环境影响，出口低迷。2012年，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204.3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3%。其中进口总额27.42亿美元，下降19.6%；出口总额176.96亿美元，下降2.6%。外贸依存度为35.3%，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0.6%，分别比上年降低6.3和4.4个百分点。至年末，与温州建立出口和进口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计205个，全市拥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9247家。

2002—2012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累计30.19亿元，是1991—2001年的5.2倍。其中2012年新签外资项目29项，实际利用外资3.98亿美元，是2000年的5.5倍，年均递增15.3%。全年新批设立境外机构47家，中方境外投资额14103万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营业额4455.57万美元。

（八）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全面发展。近十年来，在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全市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教育强市建设稳步推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卫生事业健康发展，为温州“赶超发展、再创辉煌”提供了强力支撑。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近十年来，温州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工程，科技经费投入逐步增加，科技实力迅速增强，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2012年，全市财政科技支出8.5亿元，是2000年的8倍，年均递增18.9%。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0.58%提高到2012年的1.24%。随着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的大幅度增加，带来了科研平台的增加以及科研成果的增加。2012年末，全市拥有国家级科技创业服务中心3

表4: 2012年外贸出口分类情况

指 标	出口总额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
出口总额	176.96	-2.6
#一般贸易	167.05	-0.8
加工贸易	9.83	-25.9
#鞋类	46.58	-1.4
服装	18.62	-11.2
合成革	4.70	-11.0
眼镜	7.55	0.5
打火机	0.47	-1.8
机电类	73.10	-1.0

表5: 2012年主要市场出口情况

地 区	出口额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
欧洲	67.82	-8.1
亚洲	48.33	-3.9
北美洲	26.01	12.2
拉丁美洲	19.01	5.2
非洲	12.76	-1.5
大洋洲	2.86	-9.0

个、省级科技创新服务中心3个, 国家级大学科技园1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3个、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9个,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5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148家、省级农业科技研发中心8家、市级企业研发中心242家, 科技强县5个。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02家, 累计480家。全年专利授权17267项, 比上年增长54.4%; 年末有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5家、省级专利示范企业81家。

教育强市建设稳步推进。十年来, 温州积极倡导

优先发展教育理念, 教育投入与教育水平持续提高。2012年教育经费总收入175.32亿元, 是2000年的6倍, 年均递增16.1%。其中, 财政教育投入103.64亿元, 占59.1%。2012年末, 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146.38万人, 占户籍总人口18.3%。全市拥有普通高等学校7所, 全年招生23181人。全国普通高校在温录取新生46885人, 比上年增加3546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9.5%。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比例96.47%, 其中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比例54.50%。

表6: 2012年各类学校基本情况

指 标	学校数 (所)	专任教师数 (人)	在校学生数 (人)
普通高校	7	4847	76547
普通中专	1	68	2385
成人中专	4	96	654
普通高中	123	12810	142367
职业高中	57	4261	68478
普通初中	354	22453	236784
小 学	615	29136	602532
特殊教育	8	365	2542
幼 儿 园	1554	20473	332214

文化事业日趋繁荣。2012年末, 全市共有文化站129个、文化馆12个、公共图书馆13个、博物馆(包括民营)27个、艺术表演团体10个、电影放映单位29个。全年艺术团体演出1006场次; 院线电影放映14.77万场次, 观众338.87万人次; 农村数字电影放映5.23万场次, 观众889.9万人次。年末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29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131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499个。公共图书馆藏书774.10万册(件), 年总流通量477.05万人次。全市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8.6%,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8.9%, 有线电视用户171.49万户。

卫生事业健康发展。2012年末，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5255家，其中医院109家、卫生院259家、村卫生室2993家、各类诊所（卫生所、医务室）1238家。年末有各类卫生技术人员45397人，其中医生19537人，平均每万户籍人口有医生24.41人。全市医疗机构病床26159张，平均每万人有病床32.69张。全年医疗机构诊疗病人5861万人次。继续推进农村健康工程，全市已参合农村人口514.29万人，参合率98.74%，人均筹资515元。全市新医合门诊受益人数1357.92万人次，补偿金额2.56亿元；住院受益人数46.12万人次，补偿金额23.58亿元。

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2012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204.03万人，比上年增加18.26万人，其中企业职工及自由职业者186万人，增加17.87万人。当年实缴基本养老保险费88.86亿元，全市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职工36.23万人，发放养老金86亿元。参加工伤保险217.55万人，当年实缴工伤保险费3.73亿元。参加基本医疗保险148.02万人，城镇职工当年实缴基本医疗保险费35.2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23.42亿元。

（九）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全市城乡居民收入也水涨船高，增长明显，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小康的基础上继续得到明显提高，精神生活日益丰富。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12年全市城镇单位（不含私营）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8212元，是2000年的4.3倍，年均递增12.9%。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82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3975元，其中食品类支出9074元，占37.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719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10820元，其中食品类支出4943元，占45.7%。居住条件持续改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1.25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45.76平方米。年末每百户城镇居民家用汽车拥有量39.32辆；每百户农村居民家用汽车拥有量19.76辆。

注释：

①编者注：1978年，地市未合并，应含温州地区和温州市。

（上接第20页）

了太阳能电池和组件，还包括输配电设备、电缆、元器件、逆变器以及监控系统等。把传统的工程公司和设备制造商合二为一，具有更高的议价能力。例如，2009年建成的宁夏石嘴山光伏电站一期工程98%采用了正泰设备；全系统使用的输电、配电设备等，都出自正泰产业的各大公司。一揽子解决方案不仅能提供高性价比的成本竞争力，还有各种如节省沟通成本和建设时间等方面的好处，系统集成优势和成本优势不言而喻。

2013年底，正泰太阳能收购了德国老牌知名光伏企业Conergy旗下法兰克福的组件业务，实现了光伏组件生产的国际化。与此同时，正泰与美国、德国

多家国际光伏电站投资巨头和国际金融机构开展战略合作，带动了正泰光伏组件和多种高低压系统产品的出口。作为国内光伏电站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正泰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大光伏电站建设力度，持续提升太阳能发电整体解决方案能力，加强国内外市场拓展。

过去的30年，是正泰不断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发展的30年，是坚持与时俱进、锐意开拓进取的30年。从低压到高压、从元件到成套、从成套到系统、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正泰的转型之路清晰可见。

（作者单位：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风雨历程三十载 与时俱进谱新篇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回眸》正泰集团公司典型案例材料

◇林可夫

正泰集团始创于1984年，其前身是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作坊里建立起来的“乐清求精开关厂”。如今，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工业电器龙头和新能源领军企业。现有总资产达340亿元，在册员工29000多人。产业涵盖高低压电器、输配电设备、仪器仪表、建筑电器、汽车零部件、工业自动化、光伏发电及高端装备制造等，连续多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行列。产品畅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已进入欧洲、日本、中东和非洲等国际主配套市场。

回顾30年的风雨历程，正泰集团始终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推动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艰苦起步掘得“第一桶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温州乐清市柳市镇上，以生产低压电器为主的家庭小作坊遍布大街小巷。当时，年仅20岁出头的南存辉商业嗅觉敏锐、胆识过人，也加入了这一致富实践。南存辉邀约了几位朋友，在柳市街上开起了电器柜台。一开始从低压电器里最简单的信号按钮灯做起。他们买了些简单的开关，用最土的办法将每个配件绘制在图纸上，借此了解开关是怎么工作的。4个人工作得很努力，每天几乎都要忙到凌晨3点。第一个月下来，他们4个人仅仅赚了35块钱，几位合伙的朋友很沮丧，而南存辉却心中窃喜，收入虽不高，但没亏本，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前景、看到了希望，南存辉将这35元珍视为自己创业

的“第一桶金”。

1982年春，全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开始，昔日热闹红火的柳市电器生意顿时沉寂了许多。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提出要搞活流通，形势迅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因“投机倒把”被治罪的“八大王”坐牢的被放出来了，逃出去的也陆续回来了，柳市的民营经济又渐渐恢复了元气。那段时间，当地工商部门每天平均批70多家低压电器企业。南存辉认为机会来了，且觉得既然看到了低压电器的前景，仅靠一个柜台小打小闹是不行的。

1984年7月，南存辉把自家的房屋折价5万元作为投资，与人合伙创办了“乐清县求精开关厂”（正泰集团前身）。办厂之初，8个人在小作坊里，日夜辛勤劳作。由于资金不足，他们无法加工产品零部件。工厂先是购买别人的零部件来组装，再由四处闯荡的推销员销往全国各地。即使这样，资金仍然非常紧张，按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原则，生意难以为继。后来，逐渐以个人信誉，向大家赊来零件组装，卖出钱后再付款。他们一边跑购销接业务，一边做产品，小作坊工厂渐入正轨。

求精开关厂的成长环境相当恶劣。当时，低压电器还没有技术标准，没有专业工艺。少数经营者利欲熏心，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从柳市销售出去的电器产品发生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各地电力工程事故频发，在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求精开关厂以此为机

遇，决定以提高产品质量为生存之道，开始四处网罗技术人才。南存辉“三顾茅庐”，用诚心打动了上海3位技术专家，请他们加盟。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严把质量关，1986年8月投资建立了温州第一个热继电器试验室。1988年1月领取了第一张由国家机电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从而使求精开关厂在柳市的低压电器企业群中脱颖而出。

1990年，国家采取“打击、堵截、疏导、扶持”政策，对低压电器进行清理整治。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合法的经营手续，求精开关厂成为政府扶持的对象。随后，求精开关厂一分为二，“正泰”由此诞生。

沐浴改革春风阔步前行

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正泰以成立中美合资温州正泰电器有限公司为契机，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充分利用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发展壮大企业实力，确立了电器专业化发展方向。1993年，正泰投入巨资，率先建起浙江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电器产品检测试验站。与此同时，正泰进一步完善了股份合作制，推进了企业上规模、产品上档次、管理上水平，由单纯的工厂制管理发展到规模化的公司制管理。

当时，柳市的电器行业，从家庭作坊式小厂，经过风风雨雨的坎坷历程，已经发展到上千家低压电器厂家，在全国低压电器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企业规模小、资金不集中，技术力量薄弱，产品重复生产，管理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关贸总协定“复关”在即，国内公有制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原来股份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不断减弱。企业要发展壮大，必须走集团化经营之路，在审时度势后正泰决定成立集团公司。正泰以资产为纽带，以产品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以品牌为中心，实行“纵合横联”。通过兼并联营，于1994年2月率先成立了低压电器行业中第一个企业集团——温州正泰集团，拥有

53个成员企业。同年，正泰在全国低压电器行业率先通过了ISO 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并率先在国际上申请产品认证。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股份合作制已经不适应企业向高层次、国际化发展的需求。高度集中的运作机制，开始暴露出资金运转的不灵活性和重复投产、设备利用率不高等缺陷，导致出现了集团管理机构“机关化”、人才竞争机制弱化等现象。1997年，正泰集团对所属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并以产品为龙头，进行资产重组和股份制改造，初步走上了现代企业集团的轨道。

跨入21世纪以来，正泰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围绕“产业化、科技化、国际化”战略，坚定地朝着“打造世界一流电气制造企业”的宏伟目标迈进。为打入国际市场，正泰产品通过了国际CB安全认证等，并于2002年取得了低压电器首张国家强制性认证（3C）证书，被称为中国“入世第一证”。2003年正泰集团销售额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2004年，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荣获企业管理最高奖——“全国质量管理奖”。通过积极拓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不断提升市场份额，正泰低压电器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国内行业首位。

围绕主业延伸产业链

虽然在低压电器行业正泰占据了“龙头”位置，但地位并不稳固。由于进入低压电器产业的门槛比较低，行业内竞争异常激烈。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投资或采取合资或独资的方式，纷纷来华办企业，并推出中低端产品，对国内市场虎视眈眈。前有狼后有虎，正泰充分利用危机倒逼机制的作用，围绕市场需求，加快结构调整，做长产业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用“减法”做大企业，剥离非相关、不熟悉产业，专注电器主业；用“加法”做强产业，围绕低压电器，延伸产业链条。

2000年前后，正泰先后投资6亿元兴建了正泰高

新科技园、成套设备工业园和电力变压器工业园，2003年又投入巨资在上海建立高压电气工业园和高科技开发机构，逐步进入中压、高压输配电行业，产业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随着智能电网的建设，传统电气产品向智能化升级，为适应新的市场竞争形势，正泰确立了“成为世界领先的新能源开发商和系列能效管理方案提供商”的愿景。以系统集成手段提高产品全寿命成本、提升综合能效、实现绿色环保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占据高端电器市场。先后在上海建立主攻低压电器高端市场的“诺雅克”品牌；在杭州滨江高新区成立先进量测系统研发基地，开发智能电表及满足电网即时监控需要的先进量测系统。同时，以外延式扩张来加速公司主业的成长。

2010年1月21日，“正泰电器”成功实现A股上市，成为沪深两市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促使企业步入资本经营与产品、产业经营同步发展的轨道。

2012年7月，正泰电器斥资3.15亿元收购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有限公司70%股权，由此跨入自动化控制领域，加快实现由硬件向软硬结合的产业升级。

从单一低压电器延伸到中高压产品，从电器元件延伸到成套电器，形成了为输、变、配电服务的产业链。通过对高低压电器、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等产业的集成创新，正泰走出了一条从电器产品供应商向能效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的道路。

向新能源“华丽转身”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全球能源竞争的趋势增强，谁能抢占新能源市场的先机，谁就有可能成为下一轮产业兴起的龙头。2003年，正泰集团就新能源项目选择邀请了相关顾问、专家作进一步论证，分析研究风能、水电能、生物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各个方向的发展前景。经过一番系统、慎重的调研，正泰于2006年注册成立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正泰最初选择以二代薄膜太阳能技术进入了光伏产业，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相比，硅材料占用量少、最终成本更低。当时以研制生产第二代光伏薄膜电池为主，兼顾晶硅电池的生产。在经历井喷式发展之后，2010年后国内光伏行业，连续遭遇金融危机冲击、欧美“双反”调查遏制，整个行业几近陷于惨淡境地，大量企业亏损甚至倒闭。由于多晶硅产能过剩、下游组件需求疲弱，多晶硅价格急转直下，从每公斤400美元跌至20美元，令薄膜太阳能电池的优势荡然无存。

正泰和中国光伏行业一起经历了产业的快速下滑，见证了国内外明星企业的陨落，也在行业出现普损和巨亏的逆境中启动了自己的战略大调整。面对严峻市场形势，正泰太阳能将薄膜电池制造转成研发为主，把主要精力放在电站建设、运营和晶硅电池组件的生产上。借助集团品牌、资金等资源和产业链系统集成优势，探索出一条电站投资、EPC工程总包引领组件生产、销售的盈利模式，在海内外投资建设光伏发电站及建筑一体化应用项目。

目前，正泰已在美国、保加利亚、韩国、泰国、意大利以及国内宁夏石嘴山、青海格尔木、甘肃敦煌等地开发建设光伏电站，在浙江、上海等地建设20余个国家金太阳工程和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截至2013年底，已建成发电和在建的光伏电站项目超1.2GW，2013年度电费收入达5.9亿元，成为国内光伏电站建设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

整合资源打造全产业链

通过完善上下游产业布局，正泰逐步形成了覆盖“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等全产业链系统集成竞争优势。对正泰而言，建设电站不仅能销售太阳能电池和组件，还能带动正泰低压电器、成套产品、输配电等其他系列产品的销售，形成产业优势互补，提升品牌形象。正泰拥有建设电站所需的所有产品，除

（下转第17页）

温州特色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路径探讨

◇ 李岳松

农村文化礼堂是集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技能普及、文化娱乐活动、民俗传统礼仪传承于一体的文化阵地综合体，是党委、政府的一项民心工程。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被列入省政府十件实事项目之一。浙江省从2013年开始农村文化礼堂建设，2014年是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扩面提质之年，全省要新增农村文化礼堂1000家以上，其中温州市拟建成文化礼堂277家。通过5年努力，温州全市城乡每个社区均要建成一个以上文化礼堂。

探讨建设农村文化礼堂路径，攻克文化礼堂建设中面临的困境，将文化礼堂打造成具有东瓯^①地域文化特色的农村、社区的“文化地标”，市民的“精神家园”。

一、温州农村精神家园——文化礼堂的崛起

温州市现已建成文化礼堂531家，经过两年时间的实践探索，农村文化礼堂已建设成为广大村民活动交流、开会研讨、议事办事的窗口；是参加技能培训、听课学习、读书阅览、观看展览、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文化礼堂除给广大村民提供并共享文化精神食粮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孩子解读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灿烂文化和东瓯大地独特的传统民俗文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各种活动，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

根据“文化礼堂、精神家园”的定位，以有场所、有展示、有活动、有队伍、有机制和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的“五有三型”建设标准，按照“三堂六廊八大员”的总体要求，通过闲置房利用、祠堂改

扩建或新建了一批农村文化礼堂。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各具特色

各地按照文化礼堂建设的总体要求，在文化礼堂建设中形成以文化礼堂、市民学堂、东瓯讲堂或道德讲坛为主要建设项目，因地制宜、整合联动地建设文化长廊、文化广场、文化公园；同时，结合各地实际突破性地建设村史馆、民俗馆、健康养生馆、革命纪念馆；设置励志廊、民风廊、崇德尚贤廊、成就展示廊和温商风采廊；以及农家书屋、电子信息室、廉政文化室、声乐舞蹈室、展览室、棋牌室、视听室、健身房、休闲吧等，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成为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并配备了桌椅、灯光音响等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2、农村文化礼堂的活动与管理队伍健全

全市的文化礼堂，在按标准配备了管理员、指导员的基础上，创新推广文化礼堂的“八大员”队伍建设模式，即在每个文化礼堂建立了时政宣讲员、文体辅导员、文明督导员、科普指导员、文史管理员、法制协理员、舆情信息员、网络宣传员等。至2013年底，活跃在全市文化礼堂的“八大员”已达2472人^②。

瑞安市还印发了《瑞安文化礼堂“八大员”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八大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招募聘用资格、组织纪律，及每一个岗位的主要职责和考核管理标准等。一些地方还结合本地实际，培养组建了舞蹈队、锣鼓队、器乐队、演唱队、健身队以及书画社、党员志愿者、红领巾志愿服务队等文

艺骨干队伍和文艺协会等社团组织，有力地支撑了文化礼堂的正常运转。

3、文化礼堂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文化礼堂开展了各种文艺演出、歌咏比赛、法律知识竞赛、书画展览及拔河、棋类、球类等各种文体体育比赛；并利用节假日开展新年祈福、清明祭祖、三月学雷锋做好事、端午民俗礼仪、七一纪念、暑期青少年培训、重阳敬老礼、九月开学尊师礼、十月成年礼、年终谢师礼等各种礼仪活动；以市民学堂为载体，开展农业技术和劳动技能培训学习；利用道德讲堂“诵经典、做反省、讲故事、发善心、鞠躬礼、行善举”和“唱歌曲、看电教片、学模范”等环节，让青少年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家庭美德，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主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宣传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道德实践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市民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明素养。

二、农村文化礼堂建设遇到的困难

温州特色农村文化礼堂有相当的数量是由祠堂改建而成的，在祠堂改建为文化礼堂的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困惑。一些宗族认为，祠堂是本姓族的共同财产，而一个村是由若干个姓族组成的，祠堂改建为文化礼堂供全村村民作为文化活动场所，久而久之会被误认为是全村集体所有了，本族人难免有思想顾虑。尤其是一些老人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使一些原有条件的祠堂难以改建为文化礼堂。就全市而言也不是所有的村都有祠堂，虽然一些村有两个以上祠堂，但也有一些祠堂不具备改建为文化礼堂的条件；一些祠堂破旧不堪已成为危房，他们想拆建或改建为文化礼堂，也因原祠堂危房既没有土地证，更没有房产证，无法进行危房鉴定和拆建。有些片村、中心村，急需建文化礼堂，苦于没有土地，虽然省里已下达文化礼堂建设用地指标，真正在实施报批时又遇到审批难。

一些已建的部分农村、社区的文化礼堂，由于集

体没有收入来源，缺乏活动管理费；加上农村中青年几乎进城务工，缺乏有才干的管理人员，文化礼堂管理工作滞后，平时活动难以开展。文化礼堂利用率偏低，大都文化礼堂不能按要求正常开展活动，形成文化礼堂建成后，后续的有关工作跟不上。

三、“温州特色”文化礼堂建设路径选择

一年多来，全市在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文化礼堂建设新路子，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为了建好、用好农村文化礼堂，充分发挥文化礼堂主阵地作用，结合各地建设经验和农村实际，提出温州特色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与管理的若干建议。

1、制定文化礼堂发展蓝图，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围绕“文化地标、精神家园”的定位，省里制定了《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规划（2014年~2017年）》。2014年省财政安排5000万元^③，通过竞争性分配和以奖代补相结合的形式，扶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建设选址尽量利用农村原有建设用地、盘活村集体公共用房。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由当地在省单列下达年度计划指标的10%规定用于新农村建农民建房的专项指标中优先保障^④。2013年至2015年，温州市财政每年安排800万元^⑤以奖代补专项经费，对文化礼堂建设进行扶持。按照所建数量、质量，评出市级文化礼堂建设奖励补助对象。对一二三类地区，分别奖励8万、5万、3万元；对评定为市级文化礼堂建设先进县（市、区）的，给予30万元的奖补。到2015年，全市60%以上社区要建成“文化礼堂、精神家园”，每年创建省级文化礼堂建设先进县（市、区）一个以上^⑥。各县（市、区）对文化礼堂建设也出台了相应的建设规划和奖励办法。一些镇街、村也结合当地实际作出文化礼堂建设规划或工作计划。苍南县灵溪镇溪心村在村民讨论会的基础上制定了《溪心村文化工作规划》。

2、盘活现有资源，将祠堂“蝶变”为农村社区新型的文化礼堂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大多数农村均建

有宗族祠堂。如何将这些祠堂“蝶变”为农村文化礼堂是面临着研究探讨的课题。如苍南县776个村就有706处宗族祠堂。改革开放以来,该县原有一层的祠堂,大都被拆建为二层以上的宫殿式的祠堂,而且许多祠堂建得十分漂亮。祠堂一年只有春秋两祭开启使用,平时多为空置,利用率低。据统计,这706个祠堂中自发开展文体活动的仅占6%^①。祠堂资源闲置“多”也反映出农村文化阵地之“少”。

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因势力导推陈创新,利用闲置祠堂等现有文化设施改建为文化礼堂。通过和宗族协商,在明确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原来五颜六色的旧祠堂重新粉刷为既古色古香又简朴大方,既符合农村实际又突出文化礼堂整体和谐的乡村特色建筑。在保留原有祠堂建筑风格和祠堂功能的基础上,对祠堂内部进行改造,增设市民学堂、道德讲堂、图书馆(室)、书画室、文体活动室等文化基础设施。将祠堂“蝶变”为农村文化礼堂,不仅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还避免了重复建设,减轻基层负担,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2013年苍南建成的18家文化礼堂中,有14家是由祠堂改建而来的。在全市各地已有89家祠堂改建为文化礼堂。

农村文化礼堂还可以充分整合利用农村、社区原有的文化活动中心、文化站等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资源,以及撤扩并后腾出的学校校舍、电影院、村办公楼、市民学校、成人教育学校、基层党校、党员活动室、村图书室等现有资源,通过改建、扩建或拆建成为农村文化礼堂,让“文化礼堂”成为“农村电影放映”“文化走亲”“文化结对扶贫”“送戏下乡”等活动的举办地,让市民艺术团、市民宣讲团、市“志愿者讲坛”讲师团等纷纷走进文化礼堂。使文化礼堂成为农村、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教育展示演艺的中心。

3、依赖不同的村落文脉,尽情“绽放”各具特色的文化礼堂

温州全市5000多个村分布在11个县(市、区)的平原、山区和海岛等不同地带,各地风俗民情各具特色,有些村同属一个县却风俗各异。深入挖掘当地特

色地域文化亮点,如:名胜古迹、名人故(旧)居、人文景观。梳理村落文脉,注重利用各村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整合创新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使各个文化礼堂各有主题、各有标识、各有特色,体现不同的文化韵味。为打造各具特色的“一村一堂”“一堂一品”的文化礼堂品牌提供丰富的资源。

各村按照标准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兴建的、各具特色的文化礼堂,如鹿城驿头社区的“二程理学文化”、十八家的“家文化”、双潮和板桥的“侨乡文化”,瓯海石桥村的“纸山文化”、南白象的“塘河文化”、马桥的“侨乡文化”,以及龙湾河滨的“善文化”、永嘉屿北的“红色文化”、瑞安溪坦的“梅源文化”、文成大垵的“知青文化”等,给各地起到了借鉴示范作用。

温州市是具有2200多年建城历史的东瓯古国,获得百工之乡、歌舞之乡、南戏故里、数学家摇篮等美誉。各地要结合实际打造瓯绣、瓯塑、黄杨木雕、米塑、细纹刻纸等非遗文化;拦街福、会市等民俗节庆文化;南拳等武术文化;瓯窖等遗址文物文化;以及耕读文化、儒家文化、海洋文化、红色文化、廉政文化、书画文化等。通过以实物开设特色陈列馆、纪念馆(室)、技艺体验区、图文展示馆等,增强人们对传统的民俗风情、技艺非遗、文化名人、祖训家规、村史民风等历史文化和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等现代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4、按照建设标准,结合各地实际创新文化礼堂载体

根据农村文化礼堂标准要求,按照“增量、扩容、提质”的目标,有条件的村应单独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同时与基层堂校、市民学校、人口计生学校、老年学校等共建共享。在设置陈列展示村史村情、乡风民俗、崇德尚贤、美好家园等板块的同时,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突出乡土性、草根性、独特性的地方特色内容,设置各种不同的载体,拓展创新活动阵地。主要设计归类为以下8个类型项目:“一墙(或一园)、二场、三堂、四亭、五室、六厅、七廊、八牌”,一墙:即在村、社区中心地段或适当位置利用

墙体，绘制孝敬图或其它图文（有条件的村可建设文化广场或文体公园）；二场：即电影放映场、体育活动场；三堂：即市民学堂、东瓯讲堂、道德讲堂（坛）；四亭：即善行亭、善言亭、善礼亭、善智亭；五室：即文化文娱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农家书房）、远程教育室、书画展览室、广播室；六厅：即善琴厅、善棋厅、善书厅、善画厅、善乐厅、善茶厅；七廊：即村史廊、励志廊、孝贤廊、功德廊、名人廊、民俗廊、名企廊（或温商廊）；八牌：即树立忠、孝、礼、义、廉、正、德、仁8个字牌。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确定各自不同载体的数量和名称，在统筹区域资源上凸显地方特色和互补效应，如鹿城区驿头文化礼堂将程登云故居、让·平故居、中加友谊馆统筹利用，上埠头文化礼堂整合了旧家具市场及民俗家具博物馆；永嘉县苍坡文化礼堂，将20多个专题博物馆纳入其中；有些文化礼堂充分利用当地民间博物馆、民俗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革命陈列馆、革命纪念馆（碑、室）、廉政室、文明礼仪窗；以及“红色细胞、精神引领”“温商回归，回报家乡”“大爱温州，善行天下”“微笑联盟”“乡土典范”等正能量资源，产生“以资源建礼堂，以礼堂带动阵地，以阵地支撑礼堂”的互补联动效应。通过统筹安排、整合设计，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村民和参观的群众感受到文化礼堂的魅力，使群众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接受教育。

5、组织开展各种活动，提高市民文明程度

以文化礼堂为载体，组织开展“文明村”“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举行“道德模范”“十佳市民”“好邻里”“好婆媳”等评选活动；不定期地组织农村、社区群众，观看温州市合唱团、市民艺术团的文艺下乡演出；以文联各协会文艺下乡结对和体育竞赛等各项活动为途径，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通过市民宣讲团、市“志愿者讲坛”讲师团，和农业、科技、党史、司法等有关专家、学者举办培训会、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开展时事政策、历史、国学，农业、科技、法律等培训学习教育，及议事集会、图片展出、科学知识宣传普及等

各类活动，传播精神文明；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活动，请“最美温州人”进文化礼堂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和心得体会，带动全体温州人爱温州、做温州好人，成为“学最美，教最美，做最美”的温州人；以清明祭祖、宗亲聚餐、寻亲认宗为桥梁纽带，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促进邻里和谐，增进邻里感情；开展以节日庆典、民俗活动、春联进社区、德暖社区、智行农村、“微笑邻里志愿帮扶”、重阳敬老、亲子阅读等各种活动，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气，提高市民文明程度。

通过文化礼堂舞台表演，展示传统文化礼仪，重现“春节祈福迎新礼”“清明祭祖礼”“七岁开蒙（学）礼”“学业拜师礼”“七夕新人礼”“国庆成人礼”“嫁娶结婚礼”“重阳敬老礼”“教师节尊师礼”“道德传承礼”等传统礼仪。各地要结合实际推进更加贴近当地传统的文化礼仪活动，如乐清的“蒲岐抬阁”、永嘉的“永昆拜师礼”、洞头的“开捕壮行礼”、瓯海的“瞿溪会市”等。通过现代和民间传统的各种节庆礼仪活动，传承中华民族文明礼仪，让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和传统美德根植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中。

6、整合各类人才资源，注入文化礼堂各种活动的新活力

充分整合市、县（市、区）、乡镇街、村四级人才资源，构建推行由“总干事牵头负总责”、“八大员”各司其责、“文化大使”联系指导的文化礼堂队伍体系。市级文化大使联系重点的文化礼堂，县（市、区）级文化大使联系本县的2至3个文化礼堂，并负责对文化礼堂各项活动的策划和指导，确保文化礼堂活动有效运转。各地要结合实际建立“八大员”队伍：一是由市“志愿者讲坛”讲师团成员、区市民宣讲团成员、机关宣传干部、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书记等组成的时事政治形势宣讲队；二是由离退休干部、教师、企事业管理人员和大学生村官等组成的舆情信息、网络评论和科普指导队；三是由村社区干部、“五老”人员组成的法制、村情村史宣讲队；四是由文化干部和社区、街道文艺骨干组成的文体辅导和文

化宣传队；五是由社区宗族德高望重的老人和道德模范组成的文明督导、文物普查和社会调解员队伍；六是向社会招募选拔具有文化活动与管理才能的文化礼堂志愿者，如：书法、棋艺、舞蹈、演唱、器乐、腰鼓、武术、球类等文体社团，以及党员志愿者、红领巾志愿者、巾帼志愿者等队伍，协助文化礼堂开展各项活动和管理工作。各地根据工作实际出台《文化礼堂“八大员”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八大员所需的基本条件，招募聘用资格、组织纪律及每个岗位的主要工作职责和考核管理要求等。宣传、文化、体育、科技等有关部门和文艺团体、协会，要建立不定期地对“八大员”分门别类地进行培训指导帮扶，为文化礼堂建设提供指导服务支持。

做好文艺协会与文化礼堂“联亲结对”帮扶工作，实现优势互补，将文化礼堂建成为带动乡村文明健康生活和村民娱乐休闲的精神家园。

7、建立健全长效的管理机制，建好管好农村文化礼堂

从各地自身实际出发，摸索创新文化礼堂的管理机制体制和落地建设，建好、管好、用好文化礼堂，打造有特色、有内涵，能贴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礼堂。市县两级要出台《文化礼堂管理办法》，建立健全长效的建设、管理和运行机制。一是组织领导机制：各地成立由县（市、区）常委、宣传部长任组长，由分管文化的政府副职任副组长，宣传部、文广新局、文明办、党史研究室、共青团、妇联、财政局等有关单位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二是组建专家指导机制：其成员来自党政机关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专家，全程指导文化礼堂建设工作。三是建立总干事驻堂制和文化大使联系机制：前者是把当地热心文化工作的基层党员干部、有文艺特长的热心文化人士等组成干事团，成员兼任文化礼堂八大员，其中选出一位专职总干事，负责文化礼堂开展日常活动管理工作；后者是挑一批有文化特长的热心人士担任文化大使，指导策划各项活动开展。同时明确总干事和文化大使工作职责。四是督查促进机制：由宣传部分管的领导、专家指导团、部门机关科室负责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分组

与各个乡镇街道进行结对，对文化礼堂建设进行指导和督查工作，同时建立文化礼堂“每周一上报，每月一通报”制度，并由联系领导每月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开展活动情况。五是考核激励机制：采取市区两级资金补助、乡镇街道投入、村（社区）自筹相结合的办法，为文化礼堂建设提供经费保障。市政府每年对文化礼堂建设先进镇、街和开展活动先进的文化礼堂分别给予奖励。六是探索“以礼堂养礼堂”机制：通过建立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促进会，吸收当地企业家、社会能人志士、各界热心社会文化公益事业的志愿者等为会员，将每年缴纳的会费和捐赠的资金，建立文化礼堂活动基金。有条件的村可将部分闲置的用房或场地出租，将租金专用于文化礼堂开展活动经费，按照“增量、扩容、提质”的目标，不断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温州特色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和活动正常开展，丰富农村社区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注释：

①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东瓯王国与闽越接壤，地域相当于今温州、丽水、台州三个地区。

②《309个文化礼堂“垒砌”精神家园》，载《温州日报》2014年1月9日。

③《2014年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实施意见》（浙宣〔2014〕27号），2014年3月17日。

④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浙江省国土资源厅联合发的《关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用地保障的若干意见》（浙宣〔2014〕35号），2014年3月27日。

⑤《温州市文化礼堂建设奖补办法》，《温州市文化礼堂建设操作手册》第16页。

⑥中共温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全市文化礼堂建设的实施意见》（温委办发〔2013〕86号），2013年7月23日。

⑦《309个文化礼堂“垒砌”精神家园》，载《温州日报》2014年1月9日。

（作者单位：中共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

试论“温独支”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 刘金君

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简称“温独支”，它是浙南地区最早建立的党组织。1924年，中共中央派永嘉籍早期党员谢文锦回温州筹建党团组织。他介绍在温州实业、教育、妇女界有声望的郑恻尘、胡识因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12月在温州城区侯衙巷新民小学内成立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温独支”成立后，党团员队伍迅速壮大，遍布永嘉（含今鹿城、瓯海、龙湾区）、瑞安（含今文成县）、平阳（含今苍南县）和乐清等县，进行了一系列革命工作。

而西山会议派则是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极右反革命派别。1925年11月23日，以邹鲁、谢持等为首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由于会址在西山，史称“西山会议”，参加西山会议的人则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温独支”与西山会议派斗争的原因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是分不开的。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国民党组织一向比较涣散，内部人事方面的纷扰与冲突也时有发生，历史上更是发生过多次内讧与分裂。但是，1925年国民党自身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事件，却主要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就是党内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自从1922年秋天孙中山决定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后，围绕着“容共”政策的利弊得失，国民党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

意见。

而1924年1月国民党成功改组，与中共建立了党内合作关系。这一合作极大地扩大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国民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这一发展，毫无疑问从孙中山坚持的“容共”政策中获益良多。但同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骨干，这引起了相当一批老国民党员的猜疑和敌视。“容共”还是“分共”的问题，自此即成为国民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个中心话题。一年之后，随着主导国民党政权的孙中山突然去世，从1925年3月至11月，前后不过10个月，国民党内部就三度发生严重分裂。国民党的领导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遭遇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先是冯自由等在北京独树一帜，擅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否认中央权威；接着是廖仲恺遭党内不满“容共”政策的分子刺杀，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因此破裂，主要领导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中央；最后是相当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集会，公开另立中央，与广州分庭抗礼。国民党自身组织接连三度发生严重分化，其中固然存有种种特殊的原因与背景，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们分裂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怀疑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或力主“分共”以及国共两党矛盾日益加剧的政治形势直接相关。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地区国共两党关系的形势变化。本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基本上控制在拥护改组、赞同“容共”的国民党人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手中。随着胡、汪相继回到广州中央，身为中央执行委员的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叶楚傖不得不负起全责。但上海长期受到国民党老党员的影响，反对“容共”政策的势力在上海有较强的基础。而上海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党人长期活动的基地，《向导》《新青年》这些经常批评国民党的共产党刊物也都出版于上海。因此，上海地区的国共关系，以及国民党内部关系一向十分复杂。而192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上海区委员会，“温独支”改属上海区委（又称“江浙区委”）领导。这就使“温独支”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更加激烈。

在上述背景之下，1925年11月下旬，温州的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王超凡等人秉承西山会议派的旨意，大搞分裂活动，公然操纵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及其所属的四区第一、二区分部，发电拥护西山会议派的召开，导致县党部左右派公开分裂。

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是在“温独支”建立后，接奉上级党组织指示参加国民党后组建的，当时是为了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改组后的永嘉县党部，刚开始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尚能合作共事，但是国民党永嘉县党部筹组工作一开始就有左右两派的斗争。右派势力是地主买办的代表，以王超凡为首；左派势力以“温独支”共产党员为核心，包括一部分非常进步分子，以郑恻尘为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11月，西山会议派出现。王超凡开始由左向右分化，并最终公开分裂永嘉县党部。对此，“温独支”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开展了反对温州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一、力主浙籍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二大”

1925年秋，国民党中央预定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出席代表国共各占半

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扩大会议经过紧张的斗争，推定蒋介石、经亨颐两人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宣中华、胡识因两人为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扩大会议后，浙江西山会议派头子沈定一，秘派爪牙孔雪雄来温活动，串同王超凡、魏介夫、吴江冷、孔梦稻、李伯雄等，企图推翻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代之以西山会议派分子。“温独支”在上级党的领导下，立即采取行动，并在群众中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王超凡等西山会议派在群众中失去了信用，恼羞成怒，抢夺了县党部的公文箱扬长而去，不敢回到县党部。对此，1925年12月4日，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开会，弹劾常委王超凡和委员魏介夫、吴江冷，并选举戴树棠、陈仲雷、郑恻尘为临时执委。12月27日，永嘉县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的县党部执委，项强为常委，戴树棠、胡识因、郑恻尘、戴国鹏等为执委。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各省共产党代表终于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等人的坚决斗争，国民党“二大”重申了要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开除了邹鲁、谢持等人的国民党党籍，责成戴季陶反省。国民党“二大”批判了西山会议派为孙总理的叛徒后，西山会议派一时不敢活动。

2月间，参加国民党“二大”代表胡识因返温后，传达了会议精神，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奉浙江省党部命令再度改组，把西山会议派王超凡、魏介夫、吴江冷等人从执委中剔除出去，补国民党人吴秋江、王纪为执委。这时国共仍能继续合作。这是“温独支”和西山会议派斗争的第一次胜利经过。

二、组织学生捣毁西山会议派把持的《温州大公报》

永嘉县党部成立初期，创办机关报《温州大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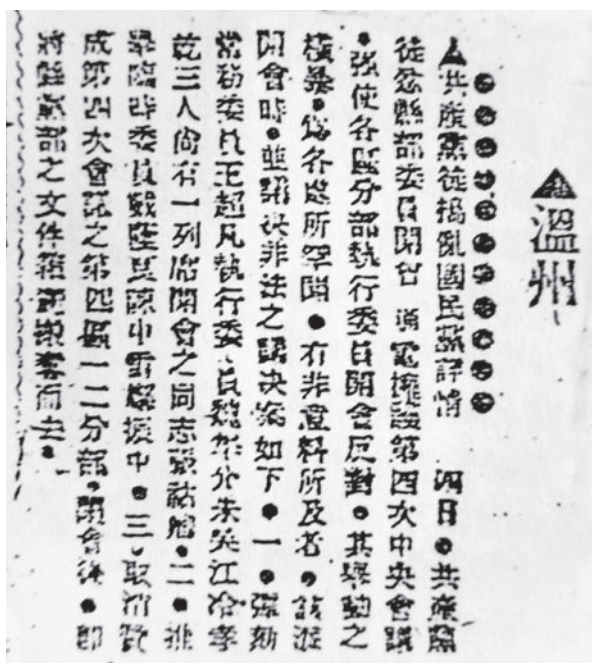
报》，地点在府前街。王超凡利用职权窃取了该报的主笔，共产党员林平海担任编辑。开始，王超凡等还能听从“温独支”的意见，刊载进步的言论和报道。自王超凡成为西山会议派分子以及两党分裂后，林平海因意见不合而离去，从此，这个报刊完全被王超凡所把持，走向反动。1925年5月11日，孙中山逝世后不久，该报登载一篇歪曲事实的报道，恶意攻击进步学生，引起公愤。经调查，发现该报道是王超凡的爪牙、一个姓管的学生写的。“温独支”师范小组，经请示“温独支”后，发动群众，召开师生大会。会上决定开除姓管的学生和捣毁报馆。校长金嵘轩表示同意开除姓管的，但捣毁报馆一事要商榷。于是叫王超凡来校长办公室谈话，学生围在外面。王超凡百般抵赖，硬说这篇文章不是姓管的写的，但又不答应查看原稿。他随同金嵘轩和学生代表苏中常、蔡雄、林枚等人一起来到报馆后，非但不肯交出原稿，竟然诬告说金嵘轩纵容学生造反。学生代表十分气愤，赶回学校加派代表前去理论时，王超凡已派了十几名警察把守门口，企图武力镇压。代表们怒不可遏，一起冲了进去。王超凡在楼上，唆使报馆里少数落后职工，持枪行凶，把桌子凳子从楼上摔下来。全校学生闻讯，手拿体操用的棍棒赶来，向报馆进攻，齐声高喊：打死管××（具体名字不详）、捉拿王超凡。门警不敢吭声，让开通道，三四百学生冲进去，手起棍落，捣毁了报馆。王超凡见状，早已从窗口溜走。学生们见人已经跑了，报馆也捣了，遂胜利回校。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对付不讲理的反动派，就要采取革命的行动。这是“温独支”与西山会议派斗争的第二次胜利。

三、促成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活动顺利进行

1926年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前夕，“温独支”得到上级指示和宣传资料，发动温州各界民众团体和学生，筹备召开盛大的纪念大会，旨在抗英运动。在轰轰烈烈的五卅惨案周年纪念紧张空气中，温州西山会议派分子竟在外制造谣言，中伤“温独支”，他们

一方面散布流言，以惑视听，从而离间民众革命势力，一方面唆使官厅当局严禁开会，并暗中向小学校长恫吓，不许小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王超凡等西山会议派分子还在印刷所拿到“温独支”的宣传单和告民众书，卑鄙无耻地献媚驻军司令，诬告郑恻尘领导共产党人施行暴动。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此为由，关押郑恻尘，并禁止举行五卅惨案周年纪念集会。广大革命群众闻悉，无比义愤，集队在永嘉县署门前，高呼救国口号，要求释放郑恻尘，要求召开纪念大会。十师学生戴国鹏等还组织敢死队，决心与之斗争到底。郑恻尘在监狱内坚贞不屈，据理力争。反动当局慑于群众和舆论的压力，被迫释放了郑恻尘。温州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如期在十中操场顺利召开，到会3000多人，会上有市民代表、学生代表讲话，再次掀起了抗英爱国运动高潮。大会通过通电八则：1. 致北京外交部，力求沪案早日解决；2. 致上海总工会，誓求十七条之总解决，并请继续援助小沙渡日厂工人同盟罢工；3. 致上海总商会；4. 致全国学联会；5. 致上海各报馆转全国同胞；6. 致国民党请继续努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7. 致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请继续奋斗；8. 致广州国民政府，请早日北伐。会后分队游行，高呼口号，一路分发传单、宣言、画报，凡三十余种。沿途观者如堵，情绪激昂。温州学生联合会还发表《五卅宣言》《告学生书》《告同胞书》及《五卅周年纪念特刊》。是日民众情绪较任何运动为热烈。当晚，瓯海公学放映五卅惨案幻灯片，观众很多。翌日晚，女子师范组织演出《亡国痛史——山河泪》《南京路之血》等爱国话剧。这期间，温州西山会议派分子始终不敢露面。“温独支”在对待国民党的工作方面较为出色，尤其是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肯定。这是“温独支”与西山会议派斗争的第三次胜利。

“温独支”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主要是以上3次，经过这3次斗争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深入人心，而国民党右派分子也更加妒忌共产党人



1925年12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
“温州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报道

了。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反共活动。1927年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召开会议，密谋以暴力手段实行“清党”，随后提出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通缉的197人名单，其中“温独支”成员和温籍共产党员有胡公冕、胡识因、唐公宪、郑恻尘、林平海、金贯真、孙道济、庄竞秋、戴国鹏、黄胤、苏眉如等12人。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浙江的国民党右派在温州开始“清党”。王超凡等组织永嘉等县清党委员会，搜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温独支”获知蒋介石政变后，于14日晚召集主要成员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然而由于邮局被封锁，得不到确切消息，很多同志被逮捕、被杀害了。“温独支”及其下属其他党组织均遭到破坏停止活动，唯中共瑞安特支依然存在，坚持斗争。与此同时，原“温独支”部分党员转入农村，与仍坚持在农村的共产党

员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西山会议派这一反动的政治集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公开制造分裂，率先打起清党反共的旗帜，成为“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先声，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国民革命的正常进行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面对西山会议派的猖狂进攻，“温独支”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进行了强有力地回击。在此斗争过程中，“温独支”在马列主义的宣传、地方党团的建设、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及唤起民众广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与西山会议派的顽强斗争事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为浙南大地播撒了革命的种子，为日后中共党组织在浙南的重建和农民武装暴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温州“大跃进”失误与国民经济调整

◇ 陈启中

一、“大跃进”运动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一）全面开展“大跃进”运动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民发动,讨论四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指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1958年5月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5月28日,温州地委召开各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农工部长等120人参加的会议,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决定6月15日至7月15日在全地区组织30万人的宣传队伍,开展总路线宣传月活动。6月27日,浙江省委第二次农业生产检查团来到温州,提出“苦战三五年,在工业、农业上赶超英、美”、要放“高产卫星”等口号,经过层层发动,高指标、浮夸风普遍出现。

在大办农业中,永嘉县永临公社林福大队早稻亩产6300斤公布后,接着瑞安凤山试验田宣布亩产4860斤,平阳城北干部试验田亩产3254斤,乐清县委组织部试验田亩产3483斤。8月20日,地委召开常委会,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到会讲话,指出:据汇报早稻亩产都在1000斤以上,晚稻产量肯定更高,每人平均有2000斤粮食,这样粮食问题就解决了,全省3200万亩土地,只有1500万亩种粮食,其他1700万亩可种经济作物,为轻工业原料腾出相当大面积。会后大批所谓“条件论”“粮食增长有限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需要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多少粮

食”的口号,提出瑞安县委城郊试验田要闯二万斤大关。粮食生产出现浮夸风、盲目夺高产、瞎指挥等严重问题。1958年春,永嘉县委在梧埭区白象乡第一农业社第6生产队搞早稻试验田1.47亩,在收割前以数株点粒推算的方法认定亩产1500斤以下,实割1200斤,亩产840斤,便被认定产量有问题,要公安局侦破。1958年7月将3个社员以破坏县委试验田罪判决2至4年徒刑,印500张布告在全县张贴(后于1959年5月27日平反释放)。同年秋,瑞安塘下公社党委办抢时间争速度,限鲍一生产队在24小时之内将3000亩糖蔗全部收割送到加工点,社员将来不及收割的糖蔗烧掉,有的把来不及运输的糖蔗丢到河里,至1959年6月还在河里捞出2万多斤。丽水县云和公社提出公路两旁三天不见青,将刚施过肥田粉的番茄和正在灌浆(孕穗)的玉米收割掉,社员不同意,便发动教师、学生收割,仅港和一个大队就少收18万斤。

在大办钢铁中,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工业上来,提出大办钢铁工业的方针。8月25日,温州地委召开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提出了开展以钢铁为纲大办工业运动,强调要完成1700万吨铁的任务,少一吨就是失败,小高炉运动实际上就是政治运动,完不成任务便给以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温州地、县都建立钢铁领导小组(后改指挥部)和办公室,提出建土洋结合小高炉3245个,生产铁57000吨、钢5700吨计划。于是,全党动员、全民发动,上山找矿,溪流洗铁砂,工



20世纪60年代鳌江老港区码头

厂、农村、机关、学校都建起了小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场，先后共建小炼铁炉5300个，动员70万人投入，其中组织13955人进行探矿和开采工作，挖矿石3029吨。建16个耐火器材厂，产耐火砖2108吨。没有焦煤就上山伐木烧炭，共建木炭窑1287门，日产木炭3000吨。温州、瑞安、乐清、玉环等市县组织大批人员到永嘉、仙居伐木烧炭，永嘉县岩坦、鹤盛、碧莲等区树林基本被砍光。没有铁砂就将群众家中铁锅砸掉炼钢，小土高炉炼出的都是不能用的废钢8400吨，造成大量浪费，仅温州市即亏损资金903万元，还发生事故31起，死39人，伤27人。广大群众日夜苦战，风雨无阻，不问工时，不计报酬，至10月28日共生产铁11848吨、钢104吨，新建了龙泉钢铁厂等企业。

在此期间，大办地方工业，新建厂矿18876个，其中县市办186个，乡镇办4321个，社办14369个；其中温州化工厂、温州机械修配厂、温州麻毛纺织厂、

瑞安综合糖厂等都是此时建立的。在山区的泰顺县也办起机械修配厂119个、钢丝厂11个、建筑材料厂85个、农产品加工厂67个，生产打稻机20456台、水泵3230台、番茄丝刨机4675台、大小农具5万余件，建成小水电站15个，开通了104公里的泰（顺）分（分水关）公路。

随着“大跃进”的发展，农村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温州闻风而动，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只一个多月时间就实现人民公社化，全区原有10491个农业社合并为156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9000多户。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全区办起了34600多个公共食堂、16000多个托儿所、9700个幼儿园、490多个敬老院，农业中学、职业学校479所，学生23700多人。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不承认个体所有制与等价交

换，经常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劳力和社员的房屋、农具、家具。瑞安县鲍田生产队无偿调用农具6000多件，鲍一生产队被调走房屋100多间；平阳县万全公社为办农场向临区大队三联生产队无偿调去房屋74间，以及双铧犁、稻桶、秧苗、土灰等。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社员自留地和屋前屋后零星果木，这些做法损害了农民利益，使农民产生不满情绪，普遍出现“归大堆”思想，说“吃公饭打公鼓，公鼓破了有人补”，纷纷杀猪宰羊，砍伐树木，对农具毫不爱惜，损坏严重，造成生产力很大破坏。瑞安县鲍田生产队原有船711艘，只剩281艘；箩3028担，只剩1626担；软箩2193条，只剩1001条；水车4929部，只剩278部，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后果。

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1959年三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不能混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界限，物资劳力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劳力、资财都要进行清算归还。1959年2月25日，温州地委决定全面展开整顿人民公社工作，改进公社经营管理，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加强财务管理。4月7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算账（即清理账款）问题，发还社员自留地，屋前屋后零星竹木、果树仍归社员所有，谁种谁收，某些“左”的错误做法初步得到纠正。

（二）八届八中全会由纠“左”转向反右造成严重后果

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由纠“左”转向反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反右倾”斗争。9月3日，温州地委发出《关于立即传达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的通知》，要求全地区立即掀起反右倾鼓干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组织报告团902个，10002人参加；宣传队8792个，177330人参加；举办各种展览1870个，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大批右倾思想，开展“反右倾”斗争。据11个县统计，受到错误批判的县委委员以上

干部19人，其中县委书记处书记7人；受到错误批判的地级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16人、县级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85人；大队总支书记以上干部5961人，受错误批判284人，占4.7%。在农村开展以社会主义教育与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整风整社运动，全区9172个生产队，已开展有7933个队，占86.6%，不少生产队干部受到错误批判，这样搞的结果，使“左”的错误大大发展起来。

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在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1960年继续跃进的指示。1月9日，温州地委传达省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提出创造条件、准备过渡和大办企业、大办水利、大办钢铁、大办畜牧场、大办教育、大办公共食堂等，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风再次掀起，且情况更为严重。许多地方向生产队抽调劳力和资金发展社有经济，在很短时间内共平调土地1072亩、房屋425间、工具设备3609件，收回社员自留地、土边地，限养家禽家畜，取消肩挑小贩，不准自产自销，大批资本主义。在大办农业中，兴办畜牧场15万个；大办水利中，至1960年3月，共开工水利工程97217处，投工6504万工；大办工业中，下达了1960年生产生铁25800吨计划，提出工业大搞四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十百千万运动（十项遥远控制、百个自动化工厂、千条自动化生产线、万项技术革新）；大办教育中，提出全民学文化，要求175万人投入扫盲学习，在三天内把农村、城镇、机关业余学校办起来，还办了温州工学院、温州医学院、温州师范学院、温州水产专科学校、温州水力电力专科学校等5所高校。

由于大办，抽调了农村大批劳力，使农业产量下降，征购大放“卫星”，挖了群众口粮，出现粮食困难。1959年，全区征购粮食15亿斤，多购3亿多斤。乐清县1957年亩产650斤，征购6800万斤，1959—1960年亩产668斤，征购1亿斤，征购增3000多万斤。由于粮食不继，食堂散伙3850个。泰顺县1960年产量

比1958年减22%，粮食征购却由1700万斤增至3400万斤，人均口粮由400斤降为282斤。由于粮食困难，各地普遍出现严重的饿病流荒状况。1960年1月28日统计，全地区118个公社患浮肿病33400人，其中黄岩、永嘉、乐清、温岭最为严重。永嘉县患浮肿病4400多人，黄岩县患浮肿5800人，已死580人。1960年7月8日统计，外流人口4.7万人，其中平阳、瑞安、龙泉流出最多，各近1万人。1960年9月10日统计，平阳、瑞安、乐清等县有416个生产队购过头粮，要求退粮510万斤。平阳县万全公社12个大队、1个社办农场，系平原粮区，正常年景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3557万斤，由于产量下降，亩产只有580多斤，征购后社员口粮只有296斤。温岭县泽国、箬横、新河3个公社，因缺粮变卖财物12524户，泽国公社有378户出卖房屋423间。永嘉县永临公社黄堡等26个队，吃过野草的有7802人，占人口33.2%。由于粮食困难，1960年11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用品运动的紧急通知》。温州地区采集蕃茄叶、蕉藕、米糖、南瓜花、水荷花、清明草、马兰叶、苕麻叶等计7340.7万斤。瑞安县组织商业部门采购代用品2万多斤，掺杂20—50%米粉、麦粉、番茄、芋艿做成代食馒头、饺子、菜饼、汤圆、饮糕、菜饭等食用。永嘉县有301个生产队、1250个食堂采集代食品605万斤，粮菜和代食品混吃，已吃掉代食品108万斤。由于粮食困难，人口外流，致使土地荒芜，猪牛大量死亡。永嘉县黄堡等26个队，土地荒芜2132亩。1959年至1960年3月平阳县万全公社饿死、病死耕牛600多头。

“反右倾、鼓干劲”运动的另一大恶果是搞乱生产关系。群众滥伐木、竹，家畜家禽大量减少，以粮为纲，挤掉经济作物；以钢为纲，挤掉小五金小手工业，使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全区木材积蓄量从1955年3100多万立方米下降到1515.8万立方米，下降48%；毛竹9000万株下降到4645万株，下降50%；茶籽12.35万担，下降74%；桐籽3.77万担，下降74%；柏籽2.13

万担，下降74%；木炭28担，下降71%。棉、麻、糖、花生等经济作物1957年14.72万亩，1962年减至5万亩。渔业由每年捕获200多万斤，降为70万斤，只占原产量36%。同时，小商品和副食品供应紧缺。温州市在248种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商品中，脱销29种，供应不足37种，小铁锅、菜刀、元钉、煤油、灯头、胶鞋、铝制品等日用品严重脱销。猪肉、禽肉、烟、酒、水产品等副食品全面紧张。1961年1月27日温州市委发出《改进特需商品供应通知》，对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26人，每人每月供应猪肉3斤、蛋类3斤、食糖2斤，对归国华侨、产妇、病人、婴儿和高空作业工人也给予照顾。由于商品供应紧张，各地“开后门”的情况严重。1961年10月20日，姚依林传达刘少奇禁止商品走后门的指示，温州地区立即作了贯彻。

在“反右倾、鼓干劲”、高指标、高征购的压力下，各地还出现强迫命令、吊打群众的现象。平阳县万全公社被干部斗争的群众有315人。宋桥大队被干部斗争、吊打的群众有21人，致死4人。1960年5月瑞安县四级干部会统计，被罚款群众319人，被殴打群众183人。

“大跃进”搞乱了生产关系，浪费了国家资产，挫伤了群众积极性。致使生产力下降，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

二、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党中央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1960年7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注意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1961年1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

（一）调整农村政策，加强农业领导

1960年11月3日，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

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出：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和某些干部特殊化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调整当前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是在人民公社中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

温州各级党委立即行动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全地区“一平二调”总数6875.86万元，至1961年6月10日止，已退赔4846.52万元，占70.49%，其中实物1384.6万元，已退还1794.83万元。青田县采取调物还物、欠钱还钱、亏礼赔礼的方法，组织三次兑现高潮。全县509个生产队，有389个生产队“一平二调”基本解决，共退赔粮食116.2万斤、土地2097亩、房屋6829间、牲畜3670头、农具64800多件。全县有21名县委常委、委员、公社书记、主任，96名大队干部，964名生产队干部向群众赔礼道歉，其中404人登门道歉。永嘉县黄田公社红旗大队，共退赔现金2500元、房屋20间，补记工分3100分，发还节约粮350斤。对1959年浮夸的产量重新进行了分配。

1961年6月18日，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精神，对公社、大队、生产队规模作了调整。全区原154个农村公社调整为940个，1583个生产大队调整为2431个，10013个生产队调整为7732个。1963年，再次调整为一乡一社。生产大队一般在100户到200户之间，生产队一般在20户左右。调整后，全地区为462个公社、6022个生产大队、53543个生产队。8月16日，恢复区建制，建立125个区公所。

1962年2月1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普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1962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已开展11705个大队，占97.45%，已处理结束有9400个大队，占78.3%。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劳分配。取消公共食堂和分配中供给制部分，社员劳动报酬现金部分实行定额计酬或评工计分，多劳多得，提取公益金照顾困难户、五保户；粮食部分采用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

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配。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适当增加自留地，全区发还和分配的自留地占土地总数6.5%。通过以上工作，落实了政策，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强农业第一线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生产。1960年末，农村共有正、半劳动力2355699人，占农村人口37.36%；公社占用劳力有123501人，占农村正、半劳力5.24%；用于农业第一线有1787156人，占农村劳力总数75.86%。至1961年4月，使农业等一线劳力达到1901579人。瑞安县认真学习中央指示，进行紧急部署，力造“到农村去”声势。至1961年9月，全县从各方面抽调28914名劳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其中县办工业596人，社办工业5411人，基建交通4042人，财贸1119人，文教卫生1585人，林、畜、副、生产福利方面14721人，职工家属、城镇闲散劳力1440人，使全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达到27万人，占总劳力的83.3%。劳动力集中农业第一线后，进行了大办农业教育，干部转变了浮夸作风和生产上的瞎指挥，生产队在种植计划、品种选择、密植程度上有了自主权。同时，发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瑞安县从县、社工业部门抽调6000多名工人，下乡上山修理各种农具29万件，为夺取粮食丰收作了充分准备。

农村经过贯彻党的政策，加强农业领导，农村经济从1962年开始复苏，农业生产得到很好的恢复与发展。1963年，全区粮食总产达到21.38亿斤，扭转了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的局面，为解放以来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

（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调整工业和其他行业

1961年10月9日，温州地委召开常委办公会议，传达周恩来总理讲话：工业问题要坚决退够，留有余地。地委研究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减少基本建设投资，先后停建、缓建了瓯江水电站等49个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由1960年的5648万元减至1964年的1831万

元。1961年开始，分别对现有企业采取保留、合并、撤销、转产等进行调整。保留温州化工厂、西山自来水厂、温州肉类冷藏库、温州水产联合加工厂、瑞安综合糖厂等一批骨干企业。调整后，全民所有制企业由330个减为183个。对已升格为全民所有制的东山陶瓷厂等51个厂、9689人，重新转为集体所有制，恢复断档停产的缂纱、花竹、棕藤、元钉、铁锅等小商品生产。

1961年7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小农具和日用品必须充分发挥传统生产力的指示》，指出大量生产锄、镰、锅、碗、缸、盆、桶等是国民经济战线上一项重要任务。温州各地认真贯彻中央指示，至1962年上半年，生产各种铁、木、竹器小农具319.6万件，比上年同期增长9.22%，供应小农具179.66万件，基本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经过调整，对新建厂设备加以配套和完善，发挥经济效益。新建东屿电厂、百丈一级电站，装机容量增至3.7万千瓦。新建动力机厂、渔业机械厂、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等48个机械厂投产。化学工业投资3228万元，建成温州化工厂合成氨、钾肥车间和有机化工厂、助剂厂、化学制药厂、催化剂厂等，开始生产化肥、农药、硫酸、盐酸、炭黑、苯酐、电石、有机玻璃等产品。新发展毛纺、丝绸、麻纺、塑料制品、啤酒、味精、香料、水产品加工等工业。对原有的日用陶瓷、地面砖厂组成综合性陶瓷产业，生产化学陶瓷、高压电瓷、耐火材料等。调整以后，工业内部关系逐步趋向协调，轻工业优势得到发展，生产力得以提高，至1964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2%，生产得到了正常发展。

调整商业。商品供应紧张，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而发展生产有一个过程，至1962年市场商品供应量仍比上年减少1423万元，49种主要商品下降16.2%，其中吃的烟、酒、食糖、水产品减20.04%；穿的毛绒、棉毛衫、胶鞋、袜子减82.2%；用的肥皂、牙膏、口杯、草席、雨伞减14%。对商品供应实

行调整，对人民基本生产所需品实行凭票供应，一部分紧张的生产资料按农业生产的不同需要，有计划组织供应，紧张商品按农副产品投售多少进行分配。同时控制货币投放，组织货币回笼，压缩支出，以及高价出售高级商品。共制糖果400万斤、糕点80万斤，高价出售1720万元，获得利润1220万元，以此缓和市场供求矛盾。同时，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一派购，结合议购和奖售、换购，提高农民投售农副产品积极性，开放集市贸易。1963年，市场供应状况有所好转。

调整教育事业，精简学校。保留温州医学院、温州师范学院（后也停办改为温州市教研函授站），撤销农专、工专、水产学校，保留22所中等专业学校和14所中等师范学校。经过精简，年减少支出340万元。

（三）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

196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下达后，温州地委作了认真研究和贯彻，认识到精简职工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是一项艰巨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各级都建立城镇人口回乡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吃商品粮人口等三项工作作了统一部署，采取统一领导、分线包干、块块为主、条条有责的办法，针对一些职工看不到农村光明前景、怕农业劳动艰苦、怕收入低、怕被人讥笑等思想顾虑，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大讲以农业为基础加强农业第一线的重大意义，明确政策。根据党中央规定，此次精简的对象是1958年1月以后参加工作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对老、弱、残、疾加以照顾。在精简工作中，组织干部到农村参观访问、回来介绍情况、进行座谈讨论，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动员自己的家属和亲戚回乡。通过以上工作，使干部和群众树立支农光荣、参加农业生产光荣的思想。然后分批宣布名单、组织欢送，当地党组织和社队干部热情帮助他们安家生产，解决住房、自留地、种子、小农具、生产用品等问题，从

第二个月起落实口粮。经过精简，全民所有制职工由1960年末的6.28万人减至1963年末的2.9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48940人，减少吃商品粮人口68615人。

（四）调整政策，做好党员、干部甄别工作。

1962年4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温州地委在几次扩大会议和县委书记会议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部署，各县、区都确定一位副书记具体负责此项工作。根据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的原则，深入细致地开展甄别平反工作，做到组织领导与发动群众相结合、个别调查与集体讨论相结合、交代政策与领导承担责任相结合、甄别平反与总结工作经验教训相结合。地区抽调600多名干部深入基层督促帮助，地委领导深入重点县作具体指导。据1962年8月5日统计：全地区从1958年以来，受批判、处分共34214人，已甄别30454人，已平反15655人。其中属省委管理的县委书记、县长以上领导干部受批判处分48人，占同级干部190人的25.2%，已甄别39人，平反30人，报省待批2人。属地委管理的各级领导干部受批判、处分132人，占同级干部784人的16.8%，已甄别88人，处分正确31人，处分错的有57人。不脱产党员、基层干部受批判、处分12381人，已甄别11612人，已平反6803人。工农群众受批判、处理13769人，已甄别11645人，已平反5884人。

对原批判、处分错了或基本错的已平反9666人，占已甄别30454人中的31.3%。这些人除“错误事实”有出入外，主要是“严重右倾”“反对三面红旗”“宗派主义”等，是把性质定错了。具体表现在：反对虚报浮夸、坚持实事求是被当作右倾保守；反对生产瞎指挥被当作不服从领导和违反农业“八字宪法”；对要求过高过急的任务尽了最大努力没有完成被当作不执行党的决定；反对“一平二调”被当作本位主义；如实反映情况被当作否定三面红旗；由于缺乏建设经验而造成工作损失被当作严重失职；搞正当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出卖私有生活资料被当作发展

资本主义；同志间正常往来被当作小集团、宗派主义；按组织原则对某些领导提出批评建议被当作反党反领导；不参加公共食堂被当作迷失方向等等。温州市共批判、处分党员、干部3400人，已甄别3184名，其中部分错或完全错的1634人。平阳县工交局4个正副局长，1958年为顶住不切实的技改工作，以促退派、革命意志衰退为由先后全部撤职，均已平反。

对批判、处分部分对部分错，给以改变结论处分6100人，占已甄别人数20%，对偶犯错误而“帽子”太大、结论不当、处分过重的干部均予以改变。

对原批判、处分正确维持原处分的14799人，占已甄别人数的48.7%。通过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发扬了民主，开拓了言路，活跃了民主生活，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不少党员、干部说自己过去不愿讲真话，不愿暴露思想，不愿向领导提意见，不愿向上级反映情况，现在要讲民主、讲团结、讲实话。使干部消除了顾虑，放下了包袱，调整了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团结。平反后干部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通过甄别平反工作，加强了集体领导，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转变了作风，推动了工作。这次甄别平反教育了各级领导干部，使他们认识到，几年来之所以处分那么多干部，不但思想上存在主观主义，工作作风上存在官僚主义，而且没有遵守集体领导原则。他们在各个平反会上都承担责任，检查了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改进了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干部深入群众，带头参加劳动。平阳县城西公社9个公社党委委员，不领国家工资，不吃国家粮食，只是公社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工分，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和一本账分配。1962年，该公社除一位分管工业同志外，8名干部实际劳动8420分，比规定多劳动2300分。公社书记廖锡龙进行养绿萍越冬越夏试验获得成功，省、地、县农业部门在城西召开现场会进行推广。1962年廖锡龙参加省、地、县、区和公社会议149天，还参加劳动130多天。1963年5月9日，毛主席在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等问题

的7份材料上作了批示，其中就有平阳县城西公社书记廖锡龙和瑞安县隆山公社。

1962年9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对所谓的“翻案风”进行批判，甄别平反工作因此而中止。

三、“大跃进”失误与国民经济调整的启示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发展各项事业的首要问题

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尽快地使国家富强起来，这个愿望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大跃进”的号召发出以后，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形成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但问题在于当时一些干部把建设社会主义、根本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问题看得太容易了，认为苦战三年和若干年就可以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任意提出高速度、高指标。影响最大的是农业浮夸，而农业浮夸是从粮食高产“放卫星”开始的。亩产粮食多少斤当地群众是一清二楚的，只要深入调查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就不难揭穿，下面怕批右倾不敢说实话，迎合了上面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思想。由于农业浮夸导致了系列政策的失误，提出大办企业、大办钢铁等几个大办，以为只要发动群众这些任务就能很快完成。这是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的自身规律缺乏深入的理解。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摧毁旧政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是靠开展武装斗争与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实现的，而搞建设则是利用原有的物质条件、生产形式和生产工具，即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这一质变形式来实现，这是解决问题的性质与变革的主体不同所决定的。由于对问题的性质认识不清，仍然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大兵团作战修水利，千军万马炼钢铁，从城市到农村搞这个大办那个大办，但搞建设毕竟不同于打仗与土改，把大搞群众运动运用到建设上来是对不上号的，这是由于搞建设虽有人与人的关系，但归

根到底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搞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物质生产各部门之间、再生产运动各环节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比例协调则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比例失调特别是工农业之间、消费与积累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就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秩序的混乱。只抓粮食、钢铁而不顾其他，以及只要依靠群众运动，猛干、乱干，就能使产量很快上去，这本身就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势必破坏经济平衡，搞乱生产秩序，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使生产力全面下降。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是发展生产的理论基础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是发展生产的理论基础，农业合作化初期对生产力的推动就是有力的说明。而在“大跃进”运动中片面理解改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以为公有制程度越高、规模越大，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搞“大跃进”就一定要搞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特点是一大二公，大，一个公社几千户、几万户，认为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曾提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就是天梯”。人民公社在成立时，农业社的全部公有财产转为公社所有，包括土地、牲畜、林木、大农具。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为平调农民劳动力提供了可能性。生产集体化，在集体经济非常薄弱的情况下，一哄而起办公共食堂、幼儿园、缝纫组、幸福院和文教事业，就不得不平调社员的房屋、粮食、蔬菜、家具、用具、炊具等生活资料。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食堂里吃饭不要钱，这是社员与社员之间产生平均主义的根源。特别是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手里握有行政权力，他就可以排斥一切经济手段，单纯用行政命令管理经济。既然公

社一级所有，公社、大队就可以平调生产队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创办本级企业，或搞无偿的大规模协作。政社合一使共产风与命令风结合在一起，是一切平调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办什么事情都搞“一刀切”的重要原因。共产风所以屡禁不止，政社合一重要渊藪。党的威望也是一种资源，如果不顾群众意愿，任意招来挥去的事干多了也是一种透支，必然影响党群关系，有损党的形象。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超前或落后两种情况的结局都是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只有在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时候才去改变它，而不能凭主观愿望随意加以变革。那种以为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就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高速度发展生产的奇迹，甚至认为不久即可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是主观臆想，欲速则不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又退回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充分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必须牢记“大跃进”的教训，处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必须实事求是，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三）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法治，是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

“大跃进”中出现强迫命令、过火斗争，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下边难以办到，就采取整风的方法开展斗争，提出“整风出干劲，干劲出措施，措施出高产”，也就是说产量不高是措施不力、措施不力是干劲不大、干劲不大是整风不彻底。因此就大搞整风，事无大小都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上来分析，与阶段斗争相联系。经常以大鸣大放辩论的方式来点名批判，压制不同意见，并加以组织处理。“大跃进”中，批判、处分那么多干部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造成的。当时虽然发表了毛

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但在这个理论提出不久，出现了混我为敌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后这种错误愈演愈烈，受伤害的群体越来越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简称“正处”）提出后没有做到“正处”，这是什么原因？“正处”理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中，以“正处”分析社会现象，能把握方向、分清是非，团结人民、打击敌人。但它不能取代也不能越过法律，不能替代体制与制度的设计，在具体处理人与事中必须依法办事。“正处”与法治不同，“正处”的主体是党与政府，民主是领导者手中的方法，法治的主体在民，民主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违法的得以制止与制裁，守法的受到保护。以敌我为准绳，则阵线模糊，有可能将任何人划入敌人的范畴，也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留下一个缺口。特别是频繁的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中，最易于混淆敌我。在“大跃进”运动中，一些干部强迫命令、吊打群众，对出现饿病流荒的严重情况漠不关心，这当然是不应该，但当时任务重、压力大，怕被批判为右倾保守或因邀功请赏，而置群众利益于不顾，这也只能说是人性的一种扭曲，若把这些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也是不确切的。农村在改造三类队时，认为凡是三类队必有坏人破坏，并以此为框框去套，也使一些干部怕定三类队，干部怕被划为坏分子要坐牢而提心吊胆，这也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造成的。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的制度。必须加强法制，保障人民民主，实行法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四）坚持实事求是，纠正“左”的错误，是一切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可靠保证

“大跃进”中，出现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和急于过渡都是“左”的错误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可能性，也使广大干部群众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增强了信心，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发动“大跃进”的客观原因。提出“不断革命”论是发动“大跃进”的思想基础，认为“左”比右好，只批右不批“左”，只反冷不反热，为“大跃进”营造了思想条件和社会氛围，批反冒进，批观潮派、算账派，批“右倾”保守，是使各项指标层层加码推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大跃进”中“左”的错误最大特点是片面性，片面强调所有制改造后的生产大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对于客观困难与不利方面估计不足；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忽视了客观的可能性；片面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注意同实事求是相结合；片面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灵魂，实际上是“多快”压倒一切而忽略“好省”。抓住一点当作全面，抓住现象当作本质，提出“只怕想不到不怕办不到”的口号，这种来自于对主观能动性的特殊的盲目的自信，是社会主义建设上犯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严重错误，在发展生产上盲目追求高速度，急于求成。这种主观片面性的发展离开了实事求是唯物主义路线，从而在政治路线上和组织路线上也出现一系列错误。

在批判“右倾”保守、拔白旗、插红旗的巨大压力下，各级干部都怕沾上右倾的边，“五风”就成为这种巨大压力的苦涩回报。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将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混淆了党内斗争与社会阶级斗争的界限，埋下了把社会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逐渐转向党内斗争的种子。“反右倾、鼓干劲”的大规模开展，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使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状况，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损害，任

何不同声音都噤若寒蝉，形成举国上下众口一词，讲话只讲三、六、九（三面红旗正确，一切事情都要从全国六亿人民利益出发，成绩与缺点比起来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和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种情况表明思想僵化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由于思想封闭，下情不能上达，消息失真，对形势分析往往作出错误判断，这是造成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当“大跃进”出现经济困难，各地都搞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本应及时纠正“左”的错误，调整政策，以利恢复和发展生产。然而在“反右倾、鼓干劲”运动中，宣传“大跃进”的“重大成就”，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只要稍有微词，就成了对立面，成了“右倾”分子而加以批判。进而提出继续“大跃进”，要积极创造条件准备过渡，且范围更广、影响更大，这无异于把国民经济推向更加困难的深渊。

产生这种明显幼稚与极端的“左”的思想，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和缺乏民主的表现。思想禁锢，个人决断决定一切，将“共产风”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加以颂扬，把“一穷二白”当作优点予以肯定，造成思想混乱。以上种种说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民经济调整就是突破停滞机制，冲破思想牢笼，纠正“左”的错误，放弃离开生产力发展的纯粹空想而回到现实中来，回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中来，使国民经济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

（作者系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沙城镇志》

出版及文化积极作用

◇ 张声和

沙城镇志，是全市二轮修志中最先出来的一部镇志，是一部资料详尽齐全、具有存史意义的镇志。它记载了沙城的460年历史，也记载了有永嘉盐场之始的唐肃宗乾元元年至今1200多年的历史。

这部镇志是《龙湾区志》编纂过程中产生的“志中志”，有75万字，其最大的特点是乡土文化的特性强，其中氏族、文化、民俗、语言、人物均是本土的文化部类，文化志稿的字数占了将近一半。特别是氏族的脉络记载得十分清晰，是一种“根”的文化。现在修谱很时兴，但也不那么严谨，镇志中记录了当地的氏族，有相对的可靠性。用项友仁先生的话来说，“此志为官修的民书”，意义也在于此。龙湾地域和行政的归属变化大，就是当今的沙城，已经不被称为“镇”了，而被称之为街道和社区了。所以说，镇志就是抢救性地记录了这段历史，适应了时势。

另外，《沙城镇志》对于经济部类的记述也较齐全，农业、林业、畜牧业、盐业、渔业、工业、商业、金融业按主次编排，看得出这里的历史上的业态主次，以及与民生相关的产业的变化。现在各地的镇志编修都有厚此薄彼的做法，要么是老先生写的，文化民俗占比重，忽略了经济活动；要么是年青同志写的，重点记政治和行政体制，文化占的篇幅较少。而《沙城镇志》的编纂者，老中青结合，志稿有一定的平衡度。

沙城的党政领导和民间非常重视文化，把镇志编修作为文化发展的一项主要工作，这是好的现象。去年底，我在龙湾历史学会换届的年会上作了一个《城市与城市文化》的发言，今天我就借镇志的首发来讲讲文化的积极作用。

文化是个多面体，既然是多面体，就有积极和非积极的。文化不能等同于某种很好的东西，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并有好坏之分。好的是支撑力，不好的是阻力。比如，生活在变化，而文化一直不变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的保守性的惰性就表现出来了。我们要宏扬积极的文化，比如修志写史就



是积极的文化。

为什么说文化是个多面体？虽然人们对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虽然文化走向只能预测不能推理，但是，如果需要研究文化建设的路径与方法，既要排除一些不必要的文化误读或者文化行为的误解，又要积极引导积极向上的基层文化。

一是要倡导人民群众精神充实型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以个人的内心体验、幸福观、感恩、爱、分享、信仰、友情等为内容，是个人自我充实、促进幸福感的基本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都比较容易陷入交流的缺失。特别是内向的人或者自卑的人更容易陷入这种境地。因此，这就需要能够主导环境变化的人促进一种交流和关心的文化建设。

二是要倡导提升型的文化。这种文化中的提升，主要目的是针对个人素质的提升和智慧的提升，是专业欣赏能力的提升。专业人士可以帮助提升非专业人士，如艺术鉴赏、哲学思考、沟通能力的促进以及品味的提高等等。现在新农村建设，有些地方由于缺乏文化的提升，导致花钱建设达不到目的，甚至是产生了破坏环境的作用。提升型的文化，也要满足基层群

众的文化需求，包括公益性的满足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文化产业满足大众的快乐。满足型文化是雅俗共赏的文化。

三是要倡导支撑型的文化。文化是有支撑力量的，可以支撑一个社会健康发展、支撑社会成员之间良性互动以及支撑事业、机构稳定发展。如制度文化、商业文化、企业文化、职业道德等等。支撑型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文化是需要积累的，包括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加以积累，对历史文化的记录等。《沙城镇志》的编纂，就是文化积累的工作，是会对地方事业起到支撑作用的。

四是要倡导纠偏型的文化。文化活动作为体现人性和社会选择中的复杂现象，往往包含着不健康的意识和行为。我们要通过健康向上的文化的宣传，予以释放消解。例如，公平感与公平的标准不一致，人们就需要纠正对公平的意识；或者制度不公平就需要改革或者改善等。纠偏型文化，可以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激发人们产生进取动力。

（作者单位：《温州市志》编辑部）

志书编写流程与注意事项

◇ 陈建敏

一、关于资料搜集与志稿试写

(一) 资料搜集。地方志是资料性很强的著述。胡乔木同志说：“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地方志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搜集资料是修志初期的中心工作，也是贯穿全志全过程的重要工作。

1. 资料种类：分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

文字资料：一是档案资料。档案资料是在实际活动中形成的，不是事后编写的，是历史活动的原始记录，是原始性最强的资料，具有较强的可靠性。档案资料中的工作计划之类的文件，只能作为寻找资料的线索，不能视作既成事实而直接引用。二是报刊资料，包括报纸、杂志、会刊。能反映基本情况和线索，特别是所记的时间、地点、人名一般比较准确。三是私人著述，指的是笔记、日记、信函、著作、回忆录等。

文字资料还包括志乘谱牒，各种乡土小志、宗谱都有收集利用的价值。在修志过程中，一些人物资料、灾情资料、历史事件资料，有些是从宗谱中得到的。使用宗谱资料要注意修谱之人，有时为增一族之荣，会将同姓历史名人附会在本族之内。

口碑资料：指亲见、亲闻、亲历的回忆口述。

实物资料：主要指文物、工艺品、工具等实物及其照片。

2. 资料搜集方法与程序

方法：广征与特约相结合（或者叫面与点相结合），查档与查访相结合。注重有目的地约请当事人、知情者提供资料。一些回忆资料，往往把时间搞

错，张冠李戴。因此，从回忆资料中得到的线索，要查档进行印证。

程序：先内后外。各部门先查本部门资料，县史志办组织人员查档案馆档案。部门档案是修志资料的主要来源，同时又比较容易查到，因此要先查，一个方面一个方面查过去。有些资料本县查不清楚，还要到省、市档案馆、图书馆去查。本地是普查，到外地是有目的地去查，带着问题去查。

3. 如何整理资料

编号登记：按资料种类分类归档，可分为档案资料、书报笔记资料、口述回忆资料、实物资料。也可按内容分类编号，可分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部类。资料不分类编号，使用起来很麻烦。可以设计一张表格，设如下一些栏目：编号、资料题目（没有题目可暂拟一个）、资料作者、资料成文时间、资料形式（原件、抄件还是复印件）、资料来源。编号登记、装订成册。这样资料不会搞乱，使用起来方便。

建立卡片：一事一卡，按志书篇目归类，使用时便于查找，同时又便于看出资料够不够用、还缺什么。资料卡片也要有题目，没题目的要拟一个题目。以后分给谁编，也做好登记。

试写、汇集专题资料：各承编单位可先撰写专业大事记。通过编大事记，一方面熟悉资料，一方面把本部门专业发展情况的脉络理清楚。也可按几个条目试写，从一些编中选择几个章、节来试写，如从《农业》编中选一个章，从《教育》编中选一个章。通过试写，消化资料，熟悉志体（体例），把文笔统一到

志体上来，也可以及时检查资料占有情况。不通过试写，资料是否齐全并不一定清楚，一动笔就清楚了。试写还可以进一步核实资料，取得编写志书经验，从试写中总结经验教训。

(二) 篇目设计。篇目是志书的框架、体例的具体化。旧志有纲目体以纲统目、有门目体平行立目。新志书通行编章体，分编、章、节、目4个层级，一般编章均应有无题小序。

1. 篇目设计原则

一是按事物性质分类立目，不能按部门隶属关系设计篇目。如粮食问题，一般都是采取生产归农业编记述，销售归商业编记述，加工归工业编记述。也有专设粮食编，生产、销售、加工、储运统在一起写。二是要反映地方特色。从地方实际出发设计篇目。篇目设计也可以参考、学习别人的设计，但不能盲目模仿别人，要从本地出发。为突出地方特色，可以搞一些特色篇目。三是篇目要求归属得当，编章节目层级要清楚。四是同一档次事物地位要平衡，同类事物处在同一节里，彼此地位不要太悬殊，彼分四目，此只一目不可取。

2. 篇目设计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横分不能绝对化。不能片面理解横排就横分到底、分到不能再分为止。分得太细，出现层次过多，必将削弱可读性与科学性。二是交叉重复应避免。只能根据一个标准划分篇目。如工业经营体制，可按经济所有制成分分、可按工业管理系统分（二轻、乡镇）、也可按工业所属部门分，但不能在同一章里交叉重复，否则划分标准就会不统一。三是特色事物升格要慎重。反映地方特色可以把一些特色事物加以升格，但要慎重不能破坏结构整体性，以免造成章节之间的不平衡。

(三) 标题用词。标题用词要求准确、精练、朴实，一般用名词或词组，不能用句子，忌用修饰语，尽量避免出现虚词。

常见的几种弊病：一是不合志体。标题大多有

标语口号式、教科书式、广告语式、总结报告式、公文式等痕迹。二是逻辑毛病。如某志书一标题：“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生产力”。劳动力和生产力两者是从属关系，既用生产力作标题，就不能出现劳动力一词；如内容是讲劳动力，就以劳动力作标题，不用生产力这个大概念。三是语法毛病。如条目“品种和繁育”“疫病和防治”。品种、疫病是名词，繁育、防治是动词，名词不能和动词并列，应去掉“和”字，改为“品种繁育”“疫病防治”。四是概念不明确。标题与内容要相对应，标题不重名，不要出现完全相同的标题词。标题“服务与管理”“管理与服务”，就过于概念化或简化的过分。如某县志《人事劳动、社会保障》编的管理改革章，若稍加几个字，改为“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就好一些。又如该志《教育》编几个节的标题都是“发展概况”，其实加四个字就行了，“义务教育发展概况”“学前教育发展概况”“民办教育发展概况”。标题的字数太多太长不好，但过于简化也不行。

(四) 大事记。大事记可以使人们对一个地方的历史及其发展，有一个纵贯古今的了解，从宏观上获得全局性的认识。大事标准没有死杠子，实际编写中不可能拿别人的框框条条去套，只要掌握大事的标准即可。

1. 大事的标准：当时影响较大、事后影响较久的事；代表社会进步的新生事物；不记感到遗憾之事。

2. 大事记的体例：历史上的大事记多为以编年体为主的纪年。所谓编年体即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如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都采用这种格式。现在编大事记，一般都是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体。大事记在纵的方面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在横的方面，包括历史和现实中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大事、要事。

3. 要注意的事项：空泛大话并非大事；不完成

之事非大事（只提出计划或口号，未实行）；记述不准的不用。

（五）综述。综述的作用是在于使读者以较短的时间了解地情特点、概貌以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与大事记一起总摄全志，以彰显因果。地方志书横排门类，不易反映事物之间的联系，有些就须靠综述来弥补。

1. 综述内容一般分三个方面：一是沿革及基本情况，二是县情特点和优势（也可举出劣势），三是本地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的联系。

综述篇幅小、容量大，地情的方方面面以及古往今来的发展轨迹，均须浓缩在几千字内（5000~7000字）。

2. 综述的两种基本写法：一种是横排铺陈，即将地情分别列几个方面逐项交代。这种写法优点是容量大，回旋余地大，写起来铺得开，比较好掌握；弱点是把握事物联系难。一种是总结式提炼特点，把地情总结出几大特点来写。例如什么“旅游之地、××之城、××之域、××之窗、××之乡”；这种写法特色鲜明，但反映历史深度不够。

一般来说，综述要在全面写出地情（从历史到现状，写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人民群众的艰苦创业精神）的前提下，突出当地特色，综述中的“述”，不宜过细，而是粗线条的。具体记述是专业篇章的任务，不是综述的任务。综述最好在全志初成后再写，对地情的理解有一定程度之后，写起来把握性大一些。

（六）文体。地方志文体的基本要求是“叙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文字一般采用秉笔直书的写法。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书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地方志的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地方志的任务是“记述”，这就决定了志书只能使用记述体，而不能采用其他文体。记述文体有6个必要的因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和结果。在记

述文体中，必须直接或间接交待清楚这6个问题。是非、功过、得失、褒贬、盛衰、成败、经验教训等要寓于记述中，让事实说话，不须评论。

1. 注意避免的事项：注释性的议论；主观想象的议论；以抽象结论代替具体记事。在叙而不议的原则下，有些事亦可作一些画龙点睛的提示，但用法要慎重。

2. 志体与其他文体的区别

（1）区别于文艺文体。文艺文体允许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故事和人物；方志体要求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允许有所谓“合理想象”。

（2）区别于议论文体。议论文具有三要素：即论点、论据、论证，通过摆事实来讲道理；志书重点在“记”，以资料取胜，寓规律于资料之中，不杂以评论、论证。

（3）区别于公文文体。公文文体包括命令、指示、批复、通知、总结、报告、计划和法律文书。一不小心，很容易把志书写成总结体。总结大致由三部分內容构成；总结的名称、总结的正文、总结的署名和日期。志书虽然也要体现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但不能像写总结那样总结几条经验，再罗列几条教训。经验、教训必须寓于对事实的记述之中。

（4）区别于科教文体。科教文体如教材、讲义等，它以严密的逻辑思维解读各种定义、定理、公式、方法。志书也有知识性，但它体现于资料之中，专题说明一般不入正文；各专业志在突出行业特点时，会涉及到一些生产过程、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但不能写成企业管理学、产品说明书、商品广告、科普读物。

（5）区别于新闻媒体。新闻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即导语、主体和结尾，它的写法不拘一格，可以描写、议论、鼓动、对话甚至穿插。志书行文要求简练，不写套话、平铺直叙；新闻通讯写人物可以描写外貌、性格、举止、言谈，而志书人物只要求记叙其主要事迹。

(6) 区别于史体。史书是述史, 志书是存史。史体以时系事, 志体以类系事。史书在结构上一般采用竖排横写(按时间发展纵排大篇, 每篇横写社会发展方方面面); 志书则采用横排竖写(横排分类、竖写发展过程)。史体作者可以出面评论, 史论结合, 可以抒情也可以议论; 志书不需要作者评论功过是非, 也不要夹叙夹议, 必要时至多三言两语画龙点睛而已。

(七) 文风。志书用语体文来写。主要把事情记述清楚, 不夸张、不议论、不修饰, 不说大话、套话、空话, 不用概念代替具体事物的记述, 避免工作总结式、新闻报道式、教科书式写法。“朴实、严谨”是志书文风的基本特点。朴实, 即文章要写得踏实、不浮夸、不滥用形容词。如某志记述自然灾害这样写: “陡降冰雹近一个小时, 雹大如拳, 40亩秧池荡然无存。”事实上再大的冰雹也不可能把秧池打得“荡然无存”, 用“荡然无存”形容秧池受灾不合事理。严谨, 即语言表达上要注意语法、修辞、逻辑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逻辑上要把话说得对, 说得合乎事理; 在语法上要把话说得通, 合乎大众习惯; 在修辞上, 要把话说得美, 不出现错词、错字、语病。志书的语言, 必须力求准确、鲜明、简练、生动, 且具有时代特点。

二、关于重复交叉问题的处理

重复的应当尽量避免, 交叉的应当尽量处理好。

(一) 交叉的表现方式。交叉现象主要有三种: 即编与编的交叉, 章与章的交叉, 一编之内、一章之内的相互交叉。

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是事业上的交叉。如科技事业涉及的有工业科技、农业科技、卫生科技、交通科技、邮电科技。流通商品中流通方式的现代化就涉及商业局、供销社、物资总公司、粮食局、经贸局等机构。

二是体裁上的交叉。目前志书一般都采用志、

记、传、述、录5种体裁。5种体裁中, 除录以外, 志、记、传、述中都有可能产生记述内容的交叉。4种体裁中, “志”中可以根据各专业的不同特点和要求, 适当展开; “述”中只能简要一提; “记”中一般概述其始末; “传”中一定要紧扣人与事的关系来写。

三是地域上的交叉。即乡镇、部门之间的外部交叉。

(二) 产生交叉的原因

一是由地方志书的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之间(即现行管理体制)的矛盾引起的。由于行政部门的社会分工, 志书篇目之间, 既有对口的方面, 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商业局只管商业的一部分, 教育局不管卫生学校, 电力局、水利局都可以管农村小水电。

二是社会化大生产必然会给志书带来交叉。如粮食编反映粮食征购、销售、加工、储存、输送, 但流通过程中又涉及农业、交通、商业、税务、物价、工商、基本建设等内容。

三是机构变动和体制变化过多, 使交叉应运而生。由于机构改革, 有些事业或行业有时属于这个局领导、有时属于那个局领导, 有时撤、有时并, 有时升格、有时降格。写现状可以找时下管理部门, 写历史就只有循当年的轨迹了。

(三) 合理处理交叉。既然交叉是一种客观存在, 要消灭交叉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交叉问题处理得妥当一些、合理一些。

一是分清主次, 详主略次。对于事业交叉, 要以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 分清谁是主管, 谁是兼管; 谁是主业, 谁是副业。如江河湖泊: 地理环境编中, 应作全面系统的反映, 要把其形成、变迁、现状写清楚; 水利编中, 只从水利水害角度来写; 电力编中, 只从发电角度来写; 农业编的养殖业中, 只从水的养殖利用角度来写。

二是事以类从, 合理归口。如工业生产, 原来仅计经委和二轻总公司主管, 但改革开放后出现商办

工业、校办工业、农业工业等，可采取“全行业大区域”的办法。从隶属关系看，既写经贸局的、也写教育局（农林局）的；从所有制性质看，既写全民的、也写集体的；从地域看，既写城区的、也写各乡镇的。

三是详特略同，突出个性。如志书中经济部类各篇章中的工业、农业、商业、供销、物质、粮食、财税、银行都涉及机构、体制、管理问题，是共性问题。一般地说，各专业编对共性问题都不必详细展开；因为已经设了经济管理编，已对共性问题进行专门综述。各专业编主要的篇幅应放在记述本专业的个性、特点和主要矛盾上，要突出专业自身的东西。

四是要分清专业志和综合志专业编的区别。综合志专业编要求的是专业编的“专”和“特”，而专业志则是“小而全”。

三、关于志书特色问题的把握

志书有无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衡量一部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地方志是“一方之全书”，它必须记载在地域差异性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地情特色。

（一）如何认识和看待特色

一是一种客观存在。以“风俗”为例，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同样是过春节，各地有各地的过法；同样是结婚礼仪，各地有各地的程式和排场；同样是丧葬礼仪，各地有各地的规范和禁忌。记载地方特色，就是把本区域独特的色彩、个性和风格记载下来。

二是相比较而言的。方志界有句老话，叫作“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这里的“有、优、特”就是一种差异，就可以看作是一种特色。

三是事物个性的集中反映。如经济改革中逐步形成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就是两地不同的经济运营模式特色。

（二）特色的主要内容

一是时代特色。分析、认识时代特色，就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从特定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人文背景去考察、分析、反映时代特征和时代风貌。如20世纪70年代农民支出第一是吃、第二是穿、第三是用、第四是住、第五是燃料；21世纪初第一是吃、第二是住、第三是文化教育、第四是交通通信、第五才是穿。

二是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写地方特色，要善于抓住“特色链”。如泰顺廊桥文化、百家宴，义乌小商品市场，楠溪江耕读文化。

三是行业特色。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行业，就有不同的个性特色，而地域不同行业特色肯定有所不同。如水利建设编，山区应重点写山塘水库建设，水网平原重点写堰闸建设，滨海平原重点写海塘建设，盆地重点写泄洪闸建设。

（三）如何记载和反映特色

一是在篇目设计上要突出地方特色。许多地方志为了反映自己的特色，特别是那些带有全局性的地方特色，往往采用“升格”的办法，来突出地方特色。

二是要用浓墨重彩强化特色。其实“特色”也有大、中、小的区别，浓墨重彩的是有全局性的、涵盖面很大、影响力很大的大特色，即所谓“特色链”。

三是在详略处理上要体现特色。对于一般性的内容，或者带有普遍性的内容，大致以略写为宜。而对于具有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的内容，则可详细记载。

四是在志体运用上要深化特色。如有些重大事件，在编章节目中难以全面反映，那么可以写一篇专记，附于正文之后；有些内容重要，需加以强调，可以通过照片或图的形式，随文穿插，给人以直观的印象；有些为了强调内容的特色，需要数字体现，则可用表格形式予以反映；有些内容由于受篇目限制，无法在“志体”中记述，就通过附录形式附于全志之末。

（作者单位：《温州市志》编辑部）

记离休干部李东明同志的一些往事

◇ 柯永波

最近，我读完由温州中共党史学会与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辑发行的《林鹤翔文集》。对于这位生前常作为老干部代表而出现在公众视线的人物，我为他坎坷的生活经历而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感到由衷的敬佩；同时，文集中由离休干部李东明同志写的《悼念林鹤翔同志》（见第249—251页）一文，勾起了我对由林鹤翔同志介绍入党的李东明同志一些往事的回忆。

今年春节期间，我到曾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李东明家中探访，一者表示新年问候，二者向李老及其夫人金老师分别90岁与87岁表示诚挚的祝福。岁月流逝，40多年来，我与李老先后在永嘉县罗浮中学、原温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与温州市教育学院共事，后来又一直保持联系，现在听说他俩的4位子女全家及来自外地与本地的数十名亲友欢聚一堂，为二老祝贺高寿，自然也倍感高兴。

我观察李老，他精神矍铄，步子平稳，说话流畅，便回想起他的特殊经历，更加深了对俗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理解与记忆。

搁置20多年之后重新任职令人感慨万千

1970年暑期，我从外省调回家乡永嘉县劳武中学（现名罗浮中学）任教。由于该校地处同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的瓯北侨乡，地理位置优越，办学条件较好，也集中了一批家住温州市区的名教师，当时尽管仍处于“文革”中期，但落实所谓“复课闹革命”的

氛围还是很受学生家长称赞。那时学校例行的政治学习与教研活动隔周轮换举行，担任政治课和语文课的老师为一个政治学习大组，由李东明老师与我一起主持；我初来乍到，见到李老师能将语文、政治两门主课都教得很好，班主任工作很出色，待人又和蔼可亲，很为自己遇上这位在师生中享有很好口碑的新同事感到分外满意。

由于工作与志趣关系，我与东明老师交流多了，渐渐地成为能促膝谈心的忘年交，而且在校内外比较多的工作往来中，渐渐地自己也得知李老师的一些经历，尤其是温州解放前夕，他在瑞安陶山游击区期间，曾被无端怀疑为“奸细”而差点被活埋这件事。另外，他的人生黄金时代与其他波折也令人难以忘怀：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之后，他作为温州地委宣传部的教育干事，参加了接收国民党办的《浙甬日报》工作，并兼任该报社排印工人的政治指导员，中共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日报》就是在此基础上另起炉灶的；当年8月底，温州地委针对沿海农村敌情复杂的斗争需要，决定组建文艺宣传队，指派李东明为队长，要求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教育动员群众，保护与发展革命胜利果实。他从筹建工作开始，到后来瑞安县文宣队也合并过来，发展成为有100多人的温州地委文工团，由他担任第一任团长，活跃在广大沿海农村街头巷尾，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教育效果；1950年10月，温州地委选定在永嘉县三溪区（现划归瓯海区）开展土改试点工作，组建温州地委土改工作队三溪区队。该区有18个乡镇，由李东明担任第

一乡（郭溪）土改队长，并由该乡先行一步，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在全区推广。其后，他将该乡广大农民通过土改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成为积极发展生产与支持抗美援朝的斗争中来，全区报名参军8119人，其中郭溪乡报名参军2500人，大约占了全区的四分之一强。经过政审、体检以后，全区参军入伍共计420人，其中郭溪乡占了120人，亦占三溪区的四分之一强。因此，他还曾在温州地区土改动员大会上做过经验介绍，名噪一时。接着，温州地委根据提高干部文化素质的需要，派李东明创办温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简称文化干校）并任第一任校长……总之，那个时期生气勃勃的政治环境与工作舞台，让年龄二十五六岁、精力充沛的李东明如鱼得水，尽显其抱负与工作能量，而他也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

随着新中国前进的步伐与温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李东明1953年被组织派到雁荡中学任副校长，一年之后奉命到杭州省办中学校长训练班学习1年。接着，他又先后调任当时尚属温州地区的丽水处州中学与台州黄岩一中担任副校长之职。在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有时也往往身不由己。1957年，李东明奉命调回温州地委宣传部工作，却遇到全国开展“反右”运动，根据当时中央文件精神，又得重返黄岩中学参加“反右”运动。期间包括黄岩县等划归新成立的台州专署，他自己在运动中又对某些教师划为“右派”持异议，因此被认为“思想严重右倾”而受到批判，受过记过处分。随后又接二连三的开展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而留在黄岩一中。这么一来，李东明既工作调动不成，又没了领导职位，渐渐地成了温州与台州两个地区组织都不过问的“编外”干部。

李东明向来是个务实的人，“反右”运动结束之后，觉得既没了行政职务，总不能白拿工资，就主动向学校新领导提出担任语文课教学。得到应允之后，李东明凭借原有的文化功底，认真备课，细心研究教学方法，竟然取得成功，不仅学生欢迎，被推为全校语文教研组长，还几次在全县教研活动中担任观摩教

学课，广受好评。在李东明看来，担任校长或语文教师，只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都是为学生服务，因此在小小的讲台上，同样可以全力以赴，得到学生满意，体现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能自觉为党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

1965年，李老师居住在温州市区的家中有年迈的老母亲及4名子女等人，仅由担任中学教师的妻子支撑，实在困难重重，亟需他调回温州工作、分担家庭责任。一个偶然的时机，他通过组织联系，与在永嘉罗浮中学工作的一位黄岩籍语文教师对调，于是这个分隔两地十年的家庭才得以团聚。对于这位当时享有行政十七级待遇（1985年离休时又被评为行政十五级的老干部），在罗浮中学继续当了十多年的普通教师。对此，校内外不免有人风言风语、说三道四，而李老师又一言难尽，只好听之任之，埋头干好自己的岗位工作。在李老师看来，能在人生是非荣辱生死的关键时刻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与信任，已是最大的幸运，其他波折对他个人来说都已无所谓。

机会终于光临到李老师身上。经过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1978年暑期之后，继我调到原温州地区教育局教研室工作不久，罗浮中学由温州地委点名，为李老师落实干部政策，也调到新成立的温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担任副院长，其实那时的温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与温州地区教育局教研室是同一单位，所谓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不久温州地市合并，李老师继续担任学院副院长，我俩又一起工作了多年。

这时李老年过半百，人生20多年的风华岁月已经流逝，但终于能还他清白公正，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莫须有的“奸细”案曾使其生命危在旦夕

据悉，在文革极左思潮背景下，在我们工作的劳武中学，竟然出现将李老当初年轻时参加共产党，并

成为一名浙南游击队队员时遭受冤案之事，被个别教师道听途说，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质问李老师解放前夕在革命老区为何受到“奸细嫌疑”而将被活埋云云。当时学校高度重视，及时派出调查组，前往上海向了解李东明来历的原浙南特委书记、司令员龙跃同志调查。龙跃同志明确肯定那大字报是胡说，并毫不掩饰地阐明当初瑞安县委个别领导的搞法是错误的。接着，调查组又找到原瑞安县委有关领导了解，此时他亦客观介绍了当时的有关情况，说那时是自己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怀疑李东明同志是国民党奸细，并采取“逼供信”手段，强制要李东明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是错误的，并为自己造成李东明同志在运动中受冲击表示歉意。

那么这件冤假错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东明系瑞安陶山塘上村人。据他母亲生前介绍说，解放前他们家里贫穷，只租种几亩薄田，男耕女织，养育一子三女，勉强度日；然而儿子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小学毕业时校长来家再三动员，让东明报考初中，结果以全县公费生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瑞中初中部，因此县里来的喜报队敲锣打鼓到他们家报喜，使僻静的乡间小村庄也一时闻名遐迩。由于人才出众，又有李氏家族的“祠堂田”收入的物质奖励，初中毕业代课一学期之后，又考上了不要缴费、吃饭免费的温州师范师范部，只是因为避免日军侵略温州骚扰而先后迁至泰顺、瑞安乡间上课；然而在1946年上二年级时，李东明与同班的陈培汉同学，由于带头参加学校与社会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潮，因此受到追究而要被学校除名，于是两人在该年暑期里，结伴隐蔽在听说有浙南游击队活动的名叫“湖山寺”的和尚堂里，假装当和尚，希望找到中共地下联络员，加入革命队伍。功夫不负有心人，此事被时任中共瑞安县委陶山区委书记的林鹤翔同志发现，于当年年底秘密约见了李东明，并交代了秘密的工作任务。在经过一段时间培养与考察之后，于1947年7月，由林鹤翔与另外一位同志作为组织介绍人，

吸收李东明为中共党员。在当时斗争形势复杂的情况下，为了慎重起见，李东明作为陶山区第一个入党的知识青年，还得事先由兼任中共瑞安县委书记的龙跃同志审查批准。

在林鹤翔的领导与支持下，李东明先后在陶山小学、潮至小学以教书作为掩护，在师生及社会进步青年中发展了七八名同事或同学参加革命。1947年11月，由于李东明的革命活动似被敌人察觉，上级组织考虑到李东明工作安全起见，乘瑞安县委机关举办一次党员培训班，由林鹤翔安排联络员将李东明带到隐蔽在湖岭游击区的中共瑞安县委，正式脱产入伍，成为浙南游击队的队员。而东明作为家中的寄托与希望，突然与亲友、学校失去联系，国民党当地政府断定东明已投奔共产党浙南游击区，三番五次派人来训斥、威胁与搜查，全家大小不得安宁……

党训班结束之后，李东明被分配到“荆梅工作组”去山区做贫苦农民的思想教育与党建工作。由于李东明工作深入细致，能说会道，与农民打成一片，到1948年8月，已经发展了多名党员，组建了3个农村党支部。就在“荆梅工作组”工作方兴未艾之时，瑞安县委通知他回到县委机关参加“整风运动”。这时龙跃同志不再兼任瑞安县委书记，而改由新提拔的干部担任，林鹤翔也调到隐蔽在湖岭山区的瑞安县委机关任县委宣传委员。岂知“整风运动”的后期，发生了事关李东明是非荣辱生死的风波。

一个名叫黄××的陶山知识青年，系李东明在瑞中初中部时的同学。他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联系和牵线，擅自闯入隐蔽在深山里的瑞安县委机关，由于当时瑞安县委某些领导断定该黄系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加之在审问中，黄××再三提到李东明是他的邻村初中同学，很了解他，在当时敌情复杂的情况下，作为县委主要领导就连带地猜疑到李东明也有问题。而李东明的入党介绍人林鹤翔同志，曾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过，又是从上饶集中营中脱逃重返革命队伍的，因此怀疑李东明是“内奸嫌疑分子”，进而要深挖李东明

的后台林鹤翔。于是断然将李东明软禁起来进行审问，在长达20多天时间里，无论行军或夜宿都由专人严密看管，不让休息，不让睡觉，要他交代问题；县委领导一次又一次亲自审问，要李东明承认自己是混入党内的“奸细”，揭发自己的后台，说“你坦白，说了就没事，马上让你自由”。从种种迹象看来生命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李东明在高度疲惫中无奈的采取自救的唯一办法，他假意“承认”自己是“奸细”，也假意“承认”林鹤翔以及由他联系并培养起来的入党积极分子、党员与3个农村党支部都是“奸细”，企望能凭此一搏引起特委领导的关注。浙南特委闻讯之后，龙跃同志一方面立即通知瑞安县委领导必须慎重行事，另一方面派出胡景斌（政治部主任）和徐炳全（电台台长）两位同志到陶山深入调查李东明的真实情况。调查结果证实李东明是清白的革命同志，由他发展起来的入党积极分子与党支部也是清白的；而与此同时，林鹤翔也发现自己受到监视，没有人身自由，问题相当严重，便设法向龙跃反映瑞安县委的不正常状况。在掌握了李东明的真实情况之后，龙跃同志派人将林鹤翔和李东明二人由瑞安县委转移到特委机关，另行安排工作，林鹤翔到内勤部工作，李东明被安排在宣传部，从事《浙南周报》的通俗版编辑工作。

历史的教训是杜绝冤假错案的警示牌

事过境迁，料不到50年之后，林鹤翔同志突然重提这件往事。详见李老1997年日记如下：

10月1日（八月三十日）星期三

心海波澜

我的心海已经非常平静，多年来平静得无声无息，把过去各种毁誉所引起的大小波澜都沉没在海底，在这百年难逢的太平盛世，尽享有限的安谧的生

活。

但是，今天却突然被一位不速之客又勾引起一阵不小的波澜。这位不速之客是一位80高龄的老人——林鹤翔（阿林）同志，他于今天上午8时许突然来访，相见之下，促膝谈心，心海激荡，不能平静。

阿林同志是我50年前的入党、入伍介绍人，他说我是他在解放前的陶山区做地下革命工作时发展一批进步知识青年入党的第一个对象。我入党时的申请书和自传，就是经由他递交当时浙南特委书记兼瑞安县委书记龙跃同志审核批准的。他还说当时龙跃同志对我的入党自传很欣赏云云。

他说当时以×××为主的县委怀疑我的政治问题，同他的问题有关系，阿林同志是从“皖南事变”（1941年）中逃回来的，×××等人怀疑他“不可靠”，暗中派人监视他。并企图从我的问题打开一个缺口去搞阿林同志。现在我才彻底明白：我的问题之根在阿林同志身上。我是阿林同志介绍入党入伍，×××等人以为我是“阿林帮派”中的得力助手，搞我目的在于搞阿林。但是，阿林同志是龙跃同志信得过的人。阿林同志便告诉龙跃同志，说瑞安有人盯梢他，监视他，不信任他，是不应该的……龙跃同志批评了瑞安有关同志，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于是我的问题也就随着阿林问题的解决而不了了之。

以上这次回忆录式的谈话，又掀起我一向沉寂的心海波澜。50年了，50年前遭受的一场冤屈，又重新展现在眼前：审问、恫吓、软禁、拘留，一切苦难的生活，历历在目。幸好最终没有被置于死地，人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50年来，我始终把一切小毁小誉看得很淡，但愿过着一种正派、清廉而安稳的生活，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讲的“后福”吧。

以上抄录的这篇完整日记，无疑是两位老同志、老战友，也是老朋友最推心置腹的交流。其中透露出来50年来的风雨与甘苦，只有他俩自己十分明白。但是，我想作为像我同李老有40多年交往，并深知其当

年才华横溢、抱负可佳的老革命的忘年交，为什么在人生精力充沛时期持续作出非同一般贡献的缘由了。

无独有偶。在林鹤翔同志此次来李老家谈心之后，同样在原陶山革命老区从事地下工作，并在李东明同志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担任看守与审问工作的戈文碧同志，亦多次不无反思地来到李老家谈起这件陈年旧事，并为李老如今子女儿孙满堂祝福。据说当年负责管制李东明的短枪队，为躲避敌人的夜间袭击，经常转换宿营地，而再三严厉审问东明又得不到需要的口供，为免遭拖累之苦，曾几次想掘坑活埋了事，却又觉得证据不足而未敢下手。

在人生晚年，能第一次见到时隔60多年前浙南地委书记龙跃同志对自己的公允结论，李老倍感兴奋。他在自己“2010.6.4（四月廿二）星期五”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达千字的感人肺腑之言，并在末尾说：

“……所以，我说龙跃同志在报告中所讲的关于我的问题的结论性一段话，是很有道理的，这是历史的教训。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中共在1949年全国执政以后多达六十多年的今天，仍然出现不少司法部门的‘逼供信’冤案，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必须引起党中央的认真对待。”

是的，在纪念德高望重的离休干部林鹤翔同志（享受地市级待遇）逝世1周年，并由温州中共党史学会、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为之出版纪念文集《林鹤翔文集》之际，回顾这件与林鹤翔同志有一定关联，而事关李东明同志是非荣辱生死的往事，亦能起到正确认识历史、启示后人的警示牌作用。

是为记。

（作者系浙江东方集团公司退休干部）

我为石垟老区办两件实事

◇ 林宝昌 口述 梅明 整理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后，成为执政党，肩负着领导各民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党和国家急需一大批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建设人才。党要求中青年的工农干部具有革命化和知识化，要努力提高文化水平，懂得科学知识，更好地完成人民的重托。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抽调一批年富力强工农干部到省委党校学习培训3年，学成之后分配予以重任，这是一项很光荣又很艰难任务。1953年秋，我接到永嘉县委通知，我奉调到省委党校参加干部培训学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已是3年了，在1956年的金秋季节，省委决定：从省委党校培训的300名学员中挑选20多人作为重点对象输送省工业厅工作，非常荣幸我是其中一名，我十分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和重用。

1957年，我当时正在省工业厅负责筹备衢州化工厂人事、培训技术人员工作。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撤走援华专家之后，致使衢州化工厂建设项目不得不停产下马，暂停建设。

1957年的下半年，受省委指示组织带领省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队的30多人来到永嘉县。永嘉县委根据省委的工作部署，决定一部分同志去瓯北开展工作。因为我是石垟革命根据地出生长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派我去石垟村进行调查研究。

土法上马建龙娘山水库

我一到石垟山区就深入农家，访贫问苦，边调查、边访问，在革命老区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

我同老党员、老支书多次探讨研究，并反映了自己现在看到的情况：曾在解放前出现过的一些村民在大旱天，有的是满头大汗、有的是汗流浹背湿透了衣服，还要顶着酷暑到几公里外地方去挑水；不时听到、看到有村民们为挑水次序先后而争吵甚至打架情况。

大家认为石垟山区有两件事急需要办，一是饮水、用水问题，二是交通道路问题。经过比较，“水”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因为山区的村民靠天用水，如果一个星期没下雨，农田灌溉用水就紧张；大雨下几天，山洪一暴发就会洪水成灾，农业欠收。

当时自己晚上睡不着，想过去战争年代老百姓，在敌人进村围剿时，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帮我们掩护并安全地转移。如遇干旱无水，粮食就颗粒无收只得去外地讨饭。现在已经解放了，我们该为老百姓做点事了。

一天，我召集村委会和部分党员干部，探讨如何解决村里存在的这些问题。经过大家的提议，和我一样引起的共鸣就是不能“等水（死）”，应该积极地去寻找水源，首先解决村民的“吃水、用水”问题。

我和村里几个党员干部自带干粮，跋山涉水去寻找水资源，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认为800多米高的龙娘山西麓是建水库的最佳地形，因地制宜建水库可以造福村民。大家一听说要建水库就议论纷纷，当时村里的几乎所有的党员干部不敢相信水库会建成，我就挨家挨户地做他们思想工作，他们终于经过我的耐心说服，后经村委会集体讨论一致同意后，上报永嘉县委批准建设龙娘山水库。

我和村委会委员们一起动员村民，村民听说要造水库，个个纷纷表态说：我们虽然没钱，可是我们有的是人力、有的是力量，只要大家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定能造好水库。

村民积极性很高，每天出工都有40—50多人、有时是100来个自投劳力，带着干粮和工具，不计报酬。我也带着干粮，不管刮风下雨和村民寸步不离，一起在在建的水库现场艰苦奋战。利用土法上马和祖辈们流传的施工妙法，苦干加巧干。在选定的水库周围先把淤泥、地皮用水一次次地冲洗，然后再铺上厚厚的一层黄泥用木墩夯实，又铺上厚厚的一层黄泥再用木墩夯实，经过多层的黄泥用木墩夯实方法加固建成堤坝。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957年底建成龙娘山水库。水库坝高9.5米，集雨面积1.5平方公里，蓄水量3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500多亩。龙娘山水库至今已年近花甲，曾经历过100多天的大旱天，确保全村村民的生活和农业用水，粮食取得大丰收；也曾遭受大暴雨冲击却没有出过险情。她被村民称为：“石垟的粮仓！”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建设龙娘山水库，当时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没有一寸钢筋、没有一斤水泥，没有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参加，靠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苦干加巧干的愚公移山精神。

多渠道筹资建石垟盘山公路

1983年我从市区离休后，每次在回家乡的路上，

看见这里的道路还是从前那样：仅70—80公分宽的石头山路，村民下山难、上山更难；如果村民要想参加藤桥集市贸易，只能把农副产品用肩扛、担、抬到藤桥去交易；村民养的200斤重的猪，无法运到山下，只能在山上先屠宰，然后分割成几十斤用肩扛、抬到集市再进行交易。交通不便，严重阻碍老区山区的经济发展和村民的致富，村民和村干部们盼望建公路的愿望日益强烈：要致富先修路！

早在1957年，我带省委工作队到石垟调查时，曾与村委会决定要办的两件事：第一件事，造水库已是大功告成，为村民造福千年；但第二件事，造盘山公路却因工作队奉命撤离而未办成。

在时过35年我离休后，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感激之情，我决定再次到石垟村，和村民们一起办好造盘山公路这件大事。

从石垟山区建条直通藤桥的盘山公路约有12公里，资金需要200多万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钱从何而来，谈何容易，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只有克服困难勇敢前进。

我与村委会干部们共同多次向镇、区政府要求。当初他们认为山区公路投资大、效益低，还不如移民效果好，因此要求被搁置。经过我们多次走访和耐心地做工作，终于使镇、区两级政府予以重视和支持。

我与村干部们研究决定采取多种办法、多种渠道来筹集资金。我们分头去动员石垟村一些企业家捐资，村民集资一点、兄弟村资助一点、社会各界支援一点。我带头同大儿子一起两次捐资1万元，村民们见状纷纷解囊出资，很快资金到位。

石垟村至埭马村的盘山公路从1993年开始建设，历时3年，这条公路总长12.88公里，宽近3米，总投资184万元。1996年11月14日通车那天，古老寂静的石垟村沸腾了，石垟村男女老少笑逐颜开地拥向公路边，不少老人还是第一次看见汽车，他们激动地说：“石垟村第二次解放了！”

这条公路从1996年建成后，由于养路经费缺乏，

没有正常的公路养护。特别是这条公路桥，当初只认为是山区的公路桥，所以没有考虑到台风、山洪等自然灾害因素。1999年9月4日一场特大台风的登陆，严重损坏了石垟山区的盘山公路。洪水冲垮了公路桥，汽车无法通行，上山下山的村民只能涉水过岸、冒险爬行。

此时，我心急如焚。我同几位老同志一起冒着高温酷暑，到市区动员从老区走出的，在鹿城、瓯海工作的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及一些企业家，请他们为修复老区在台风中被冲毁的公路桥出资。当时他们又担心捐的钱，会不会做其他用途，我向他们保证说，这笔钱专款专用、一分钱也不会流失，由我掌管到

底。在我的游说下，不少人动了恻隐之心，积极捐款达6万多元。我又与设计院同志商量，要求他们只把图纸设计好，我们就按照图纸设计的要求办，自己找工程队修复盘山公路桥。经过20来天的冒高温苦奋战，公路桥终于修好，又呈现出车来人往的热闹场面。

离休老干部洪水平获悉本人不顾自己已是耄耋老人，为了老区脱贫致富而奔走，特地录了鲁迅的诗赠予我：“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关于《温州史志》2015年增刊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的征文启事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抗战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人类和平、进步与正义事业作出了彪炳千秋的历史贡献。岁月虽已流逝，然而对这段刻骨铭心的血的历史，仍然需要我们去纪念、去追思、去追忆，既是缅怀先烈、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又告诉我们要珍爱和平、齐心协力、开创未来。

为更好地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本刊决定在2015年推出一期特刊。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欢迎广大作者，包括党政机关工作者、史志爱好者以及老领导、老同志们，能够积极投稿。征文截稿时间为2015年5月底。

联系人：陈 静

电 话：0577-88969623

电子邮箱：chenj@zjds.org.cn；45784248@qq.com

《温州史志》编辑部

2015年3月

永嘉古道现状

◇ 高远

1、网络

永嘉的古道，主要以与周边市、县的官邮、商贸、民间交往及楠溪江流域的重要集居村落而分布。有朝西方向与青田、缙云接壤的永青、永缙古道网络；有向北方向与仙居、黄岩交界的永仙、永黄古道网络；有往东方向与乐清连接的永（乐）古道网络和县境内以大楠溪、小楠溪及瓯江流域的人口集居区域古道网络，而众古道网络之间相互交集联接。

2、现状

永嘉古道众多，但由于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交通设施建设、人为景观改造或长期无人行走，对古道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毁，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经济、工业发达的区域尤为突出。各乡镇因城镇建设加强，人口集聚，平原古道路网基本已经消失，只有山地部分尚存，如瓯北、上塘、桥头、桥下、乌牛只有山中的部分道路比较完整，如与通村公路重合部分则已被代取。而与邻市、县接壤及人口稀少、高海拔山区的古道，至今尚有保留较为完整。而大多古道路面为草木侵占，或塌陷，原有的路亭、路碑、水井、石步、桥梁往往年久失修，残破不堪。

3、分类

根据《温州市古道普查工作方案》要求，参考《永嘉县志》的有关记载和其他文献，及本次古道普查的资料。永嘉古道按功能可分为五类：

（1）两县间交通干线——官路驿道

清光绪《永嘉县志》载本县历代曾设有官方驿

站六处，在现县境的有两处，一是地处乌牛乐清交界的瀛墙驿即方志所称象浦驿。唐孟浩然曾在此逗留，写有《上浦逢张子容诗》，诗云：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靡宇邻蛟室，人烟接岛夷。乡关万余里，失路一相悲。二是地处今桥头镇白沙的白沙驿。太守谢灵运辞官归去时曾留此，并写有《过白岸亭》诗。明代温州贤太守何文渊升迁赴京、太守文林卒于任上其子文徵明扶柩回乡皆道经此，留下了却金亭的美谈。三是经楠溪小源界坑而到缙云的，有清代瑞安士子孙希旦赴考，路过界坑而病倒于金元荣家，经老金细心调养，病好后晋京考取了探花，乾隆四十六年老金六十寿诞，孙探花不忘旧恩，送来“望重杖乡”寿匾，与“秋不南华屋外意，春山北苑画中诗”寿联，其木刻联匾今仍在。

（2）曾经有过战争的军事战略要道

今永嘉瓯北的永宁山是为郡城主山，同时也是郡城的北部屏障，楠溪经上塘的水陆古道都是古代温州的战略要道，唐代的黄巢战争、宋代的方腊战争、南宋末年的陈虞之抗元、元末的方国珍战争、清代三藩之乱、太平天国之争都以此道为战略通路，或从乐清、台州入楠溪以窥温州，或从温州欲经此道以侵乐清、台州，陈虞之、方国珍战于上塘绿嶂，方腊属部俞道安、太平军则从乐清入楠溪出此道转永宁古道窜入青田丽水，而俞道安则被消灭在永宁山道中。抗战时期，国民党的21师自乐清白石经陡门开赴枫林，遭一股日本军追剿。21师且战且退，到陡门村时，凭借

有利的地形，顽强抗击，重创日军，是为抗战时期温州战争中惟一一次胜仗。

（3）贸易古道

永嘉利兼水陆，商业自古发达，很多古道都曾承担起商贸交通之功能。主要是与乐清、黄岩、缙云、仙居这些周边邻县的贸易往来，乐清的鱼盐经楠溪古道输往缙云、仙居，两县及楠溪的竹木土产经此输往乐清。有谚语道：担盐过缙云，一日一日银。乐清湾出产的海盐经花坦、古庙或鹤盛芙蓉岭到岩头中转，由人力挑往仙居缙云，留下很多民间故事。花坦道上的金竹尖林区还有叫担盐坪的地方，因盐担歇多了，卤气所侵，至今寸草不生。

（4）专门通往宗教信仰之地的古道

永嘉民间历来信仰众多，自古名山僧道占多，一些丛林古刹多处风光奇丽的偏远山区，就有了专门由信徒朝圣进香古道，其中有乌牛寨、陶姑洞、麻谷寺、胜美尖等。最为著名的是沙头到大若岩陶公洞的古道。大若岩胡公大帝的香期期间，温州五县的信徒从水路到沙头后，一路络绎而来，过渡至坦下，经渠口、珠岸、小若口、埭头，过枫树凹到水云而入陶公洞。在公路未通时，只见此路上行人昼夜不绝。

现在保存有比较完整部分的还有苍山尖古道，从表山的水村界上山或苍坡后的大丘田上山，多为顽石所修，石级比较整齐，宽约1—2米，远近适中，行程在两小时以内，且沿途风光奇伟，视野开阔，空气清新。山顶有供奉周江龙母的娘娘宫，初建于五代，现在建筑属清后期重建。

岩坦双尖宫古道，从岩坦蛙蟆垅、或潘坑方向到横路下上山，古道路况良好，路宽1—2米。行程2小时内，沿途竹木苍翠，双尖宫后山，四五月间满山杜鹃似火，颇有可观者。

南正尖古道，在永嘉张溪与黄岩县界，海拔1246米，属永嘉第二高峰。车到南正凹后从寺院右侧登山，顽石路面较好，宽约1—2米，行程半小时。山高风大，特别凉爽，拾级而上，植物渐渐变为矮小，到

山顶则接近苔原地貌，顶部石奇岩怪，排列成阵。近顶处有齐天大圣庙，供奉孙悟空。庙旁岩下多有清泉涌出，特别清凉，可视为奇观。

芙蓉南崖、中崖古道，起处屿根，一路风光奇绝，林木优美，山峰奇异瑰丽，是处是著名的陈虞之抗元之古迹所在，多古洞寺宇，路况良好。登至南崖峰下，过宋代古刹，绕过南岩，横斜而上，转折而下到中岩。中岩峰脚有奇洞数处，洞中有宋代古刹崇果寺，洞中有清泉。出寺沿峡谷而下，路旁岩上有元代造路摩崖题刻。涧水清灵，山峰接天。下至谷底有宋代古刹一处，出谷口有陈虞之墓，经里岙到溪南，接41省道。

云山寺古道，在今鹤盛镇境内，原鹤盛、岭头、西源三乡交界处。车经西坑后沿盘山公路而上，到云山水库边的下垟自然村下车。穿过村右的一片竹林，横过溪涧，拾级而上，过一古老的石板桥进入两山拱对处，里面豁然开朗，好一片田园。左转身进入林阴古道，路面全部由条石铺成。经过一座桥就是云山寺了。云山寺始建于唐代，现还有多处唐宋刻石。南宋永嘉学派著名人物陈傅良曾经住过，传说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军师刘基相会于此。空气清新，山泉清甘。古道整齐，路宽1—2米不等，从下洋自然村上山约半小时路程。

（5）民间通道

过去永嘉村落之间连接多为顽石大路，山岭连桥，是生产生活往来的必由之路。近年来由于通村公路的全面建成，大多数古道都已废去，只有一些偏僻山岭或水边小路留下来，比如花坦黄村到枫林包岙的黄村岭还比较完整，岭头有明代柯姓先祖之墓，墓道门建在路上，旁有路亭一座，已破旧不堪。作为民间通道，永嘉留有最豪华的古道，道在枫林到上日川之间，路从山腰崖际经过，下临楠溪，潭深水碧。长约100米，路面由条石铺成，路外临水一段全部一式的青石栏杆，制作精美大气，是一般连接村落交通中最为豪华的山野古道。可惜栏杆已被人偷去一部分。

4、重点古道

(1) 芙蓉岭古道

芙蓉岭，也称护王岭。位于大小楠溪的中游，起于大若岩大洲坑，经芙蓉岭，至岩头镇郑岙村，东西走向，全长约9公里，平均道宽1米，由乱石筑成。

芙蓉岭原是联系芙蓉和白泉两地陈氏聚居村的捷径，也是楠溪大小两源之间的交通要道。岭两侧有古亭两座，是供长途翻岭人息脚避雨之处，已有数百年。小源方面之亭破旧而形制完整，大源一侧的倒塌已久，石拱桥一条（在郑岙）、民居遗址与荒废茶园等人文古迹与优美的自然山水互为映衬。古道两旁依山树林茂密葱绿，四周悬崖峭壁，只有峡谷中一条小溪由高处向低处流出，小溪四季不干，溪水清澈透明。植被丰茂，空气富含负氧离子，实乃天然氧吧。溪涧相距宽狭约300米不等，在远处看望古栈道犹如一条环状通道曲折迂回，高低层次分明，深深嵌入绿色海洋之中，十分秀丽幽静，有极高的开发观赏和研究价值。

相传汉朝王莽篡权叛乱，汉室刘秀（即汉光武帝）逃难至永嘉岩头，被追兵追至芙蓉岭（护王岭）后逃到大若岩镇龙垟村东坑地方，被当地农民萧明所救。刘秀在平息叛乱登基称帝之后，为感谢萧明救驾有功，就隆重敕封萧明为侯王，并建石殿纪念，取名为萧王石殿，现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芙蓉岭古道也是解放前我地下党活动的地区，曾是十三军、地下党交通员经芙蓉岭来往传递革命情报，为革命作出贡献。

由于芙蓉岭地理环境优越，其东邻崖下库、埭头古村、小若岩景区，与大若岩陶公洞、十二峰、石门台相接。隔岭与永嘉县芙蓉古村、岩头镇丽水街相毗邻。同时可达狮子岩、石桅岩等景区，还有金子尖、园岩洞、岩柱峰、龙潭等，是集度假避暑、休闲观光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2) 垟坑岭古道

垟坑岭，起于大若岩垟坑村，经八里山村、朱寮

村、前坪村、下寮村、十二盘，南北走向，全长约11公里，平均道宽1.2米，由条石、乱石筑成。

垟坑岭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当时永嘉县小源片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古道周边风景秀丽，岭上有亭七座，古亭、古桥、石碑等人文古迹与优美的自然山水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如今既有茂密的森林供人乘凉，更有经过林木反复过滤的充足水源，水质纯净透亮，可让人尽情欣赏。

位于垟坑岭中段的八里山村处有一“火刀岩”，此岩全身都被树木遮盖，村民们从不砍伐此“火刀岩”的一草一木，据传只有把“火刀岩”全部盖住，才能给村民带来平安，才能避邪躲灾害。一直到今日，此“火刀岩”从未外露，其山林木枝繁叶茂，形成圆盘山峦，远看犹如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里山村是攻可进、退可守的一个据点，周丕振、吴益川等革命人士住八里山村，夜间外出活动，组织发展党员进行武装起义、组织“二五减租”，当时发展了很多人加入共产党组织，发动组织打小源十三地团练，解放碧莲镇。1985年八里山村被批准为革命老村。

(3) 下寮古道

下寮古道，起于沙头下城岙，经底寮、下寮、外寮、马兰坦、中降、陈下山，至大若岩藤溪村，东西走向。古道全长约16公里，平均道宽1.2米，由条石、砾石筑成。

该古道沿途集中安乐亭、竹韵亭、杏峰亭、冷水亭，古道两侧有名木古树，周边风景优美。最著名的有五星潭森林公园，以山势耸拔，沟谷幽深，奇峰多姿，瀑潭遍布，云雾变幻，林木花草馥郁而为奇，以雄、险、秀、幽、旷而见长。五星潭景区内共有大小瀑布20多个，水潭30多个，环境幽雅、野趣、陶醉，潭深峰险、山路幽深、溪流淙淙。藤溪峡谷和瀑布群，沿岩壁急速而流，如白龙出峡，腾飞狂舞，美不胜收。建有胜利林场，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带来的北美红杉树种，部分试种于此，现已成大树。

(4) 麻谷古道

麻谷古道，起于南城街道新民村，途经古刹麻谷寺、乌牛西叶村、东樟、十八垅，至于乐清白石镇石门村，为永嘉县东岸至乐清市白石“东白古道”中的新民村横山麻谷溪段，离永嘉县城约5公里，东西走向。古道全长约16.5公里，平均道宽1.5米，路面由卵石筑成。

麻谷古道始建于唐天宝三载（744），据传由天台宗幽溪派第十七代成初祖师率僧徒开山造路，距今约有1200多年历史。古道沿途山势险峻，自然风光优美，形成了以寺院、道观为主的独特人文景观。沿途有蛇尾巴、螺丝潭、宝橱洞天、猴头洞、百廿步、神仙脚印、鸡冠峰、紫竹林、麻谷寺、比丘墓塔群等30多处景观。

宋淳祐六年（1246），乐清白石始迁祖陈恭（字谦益）从永嘉茗岙转迁白石后，该古道成为不可或缺的联系道路，是古代靠脚力跑路的最短道路。同时也是联系白石玉甌峰（道士岩）玉甌观、乌牛道际寺和麻谷寺乃至观下九峰寺、上塘孝佑宫的重要通道，使后期道教及禅宗交流变得更加方便。上塘二月十五庙会（唐天宝元年开始），白石三月初十庙会也让两地物资交流更加频繁。

“麻谷寺”是由天台宗幽溪派第十七代祖师成初、成求、成妙法师等人追寻“永嘉禅师”大师（法名释玄觉，代表作《永嘉禅师证道歌》）足迹，在今新民村横山麻谷中建造安乐禅寺，供奉“三宝佛”，传播汉传佛教禅宗。改名为后安乐禅寺，属永嘉区域内保存较早的寺院之一。

(5) 十二垅二十四盘古道

十二垅二十四盘古道，起于桥头镇溪心村，途经潘罗村，至桥下镇湖庄村，南北走向，全长约10公里，平均道宽1米，由卵石筑成。

该古道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原为菇溪桥头人前往界坑、缙云、永康、金华、杭州等地经商，进京赶考必经之路，古称状元路。界坑、石染、下岷未通

公路前，此路一直为浙南民众北上的主要通道，浙南地区食盐、鱼类水产品、纺织品等，浙北地区木炭、木材、竹制品等都经过该古道，运销海外。如今，该古道两旁绿树成荫，有凉亭两座，庙宇三处，瀑布三处，风景格外优美。

(6) 济岭古道

济岭古道，位于永嘉县西北部，起于原桥下镇韩埠码头，经桥下村、西溪下村、山根村、陈岙村、湖庄村、里村、坑口、黄村，过济根村口石拱桥桥头、山霞村、下岷村、石染村，经坎下过黄岐坑、郭坑村、泥坑口村、横彭村，经界坑，至上董与缙云分界处，经永嘉境内全长约20公里，路面由卵石筑成。

济岭古道原为通往缙云、省城至京城的主干道，后部分道路因交通发展而损坏、荒废。济岭的西边是红岩景区，红岩滌里大小景点19处，风景迷人，济岭上去是济岭半腰亭，再到济岭头，济岭山顶山凹形成元宝山，山南属于桥下镇管区，山凹北头是巽宅镇管辖，是个历史的分界线。

该古道途经济根村，存有光绪年间道路碑记；途经状元桥，该桥为块石垒砌的石拱桥，全长30余米，桥南端有石级数步，意为“步步高”，据说济岭为古时候南方举子赴京赶考的必经之途，是通京城的大道。

(7) 瓯渠至巽宅古道

瓯渠至巽宅古道，起于桥下瓯渠，途经底岙、章岙、下石坑、沙埠、麻埠，至巽宅镇巽宅村，通往缙云县，南北走向。古道全长约35公里，平均道宽2米，路面由条石、卵石筑成。

古道有路亭10多座，包括：西溪下凉亭、白羊殿凉亭、前村凉亭、上湖凉亭、瓯渠凉亭、楼坑凉亭、楼坑祭凉亭、底岙凉亭、分水坳凉亭、石坑凉亭等；有石板桥15座，包括：桥下桥、敦头桥、上湖桥、瓯渠桥、瓯渠村中桥、瓯渠村头桥、阳观桥、楼坑桥、楼坑滌脚桥、楼坑滌桥、下洋桥、支川桥、石坑桥、麻埠桥、巽宅大桥。古道周边风景优美，有大洋山市

级森林公园、楼坑漈瀑布、吊坦漈瀑布、麻洞坑漈瀑布、双联漈瀑布、灵前漈瀑布。

这条古道年代久远，是历朝永嘉的行政、军事、通商及外出交通重要通道。1929年深秋，在陈诚老家青田的战斗中突围的红军部队，与国民党部队于章岙村分水坳外伽蓝寺交战，在国民党部队的拦截包围之下，红军牺牲了18名勇士。1942年，浙江第一任省委书记刘英被捕后，国民党部队将他由此道押往永康。

（8）对山岗岭古道

对山岗岭古道，起于岩坦镇深龙村暨家寨自然村，途经仙居县淡竹乡英坑村，至仙居县淡竹乡黄坦村，两县以对山岗为界，南北走向。古道全长约12公里，平均道宽约1米，路面由条石筑成。

清代古道，始建于何年已无可考证。古道两侧遍布多种古树名木，有枫树、南方红豆杉、苦槠、大叶绒楠等。

对山岗岭古道曾是深龙村及附近村落与仙居县互通的重要通道，也是附近村民前往省会等浙北地区的重要通道，对促进永嘉与仙居两县交流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在对山岗附近有一个古庙遗址，这个古庙曾经香火鼎盛，来自永嘉和仙居的香客络绎不绝，后来随着古道的渐渐废弃，古庙也慢慢破败了。

在对山岗东边的山坡上，在东西长7—8米、南北长6—7米的一块向下倾斜的平整岩石上，分布着多幅线条粗犷的原始岩画。岩画因已有2000多年的岁月，部分风化，大部分还是清晰可辨，画像有人物、动物、简易房子还有其他类似圆盘形状。

（9）九龙山古道

九龙山古道，起于沙头镇古庙新星村，经潘垟村、陡门村至东坑村，止于乐清市四都江岙村，东西走向，全长约17公里（包括沙头镇古庙上路岙岙），其中梅岙支路5.5公里、乌龙川支路3公里、九龙山支路2公里、埭头支路3.5公里，平均道宽1.2米，路面早期用不规整的卵石，中晚期用条石铺就而成。

古道两侧遍布多种名木古树，有枫树、松树、竹

林等，形成浓荫蔽日的自然景观林带。

该古道历经数百年，仍保存完好，且人文景观众多，相传江西何文渊于明宣德年间到温州当知府到陡门村从此古道经过。沿途村庄人文景观有潘垟村吊船岩，陡门村的九龙山、百两岩、鸡冠岩、隘罗洞、平板溪、古炮台和古城墙，梅岙村的鲤鱼山和梅花苑，茅竹坑村的虹岩寺和花瓶岩，牛伦村的莲花峰等。古道经过陡门中心区域，独特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幽美的自然风光，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第五大风景区。

（10）石镬寺古道

石镬寺古道，起于东城街道大龙山村，经东城街道高山村、平坑村、金竹垟村，止于乐清市四都玛瑙村，离县城约15公里，东西走向。古道全长约22公里，其中赤水洋支路5公里、郭公山支路3公里，平均道宽1.5米，路面早期由不规整的卵石和条石筑成。

石镬寺古道为明朝洪武年间古道，始建于何年已无可考证，据传已有600多年历史。古道两侧遍布多种名木古树，有枫树、松树、杉树、竹林等，生态公益林郁闭度高，形成浓荫蔽日的生态景观林带。

古道经过陡门景区南边，沿途岩奇、水清山美，沿途村庄人文景观有高山村龙船岩和黄法仙师坟，金竹垟村的俱佛岩和方山，平坑村的石镬寺、崇隐禅寺和巨岩“天地父母”，大溪村的松罗洞，全安村的赤岩洞和龙井，上庄山村的五雷山和睡美人等景点。

（11）胜美尖古道

胜美尖古道，起于三江梅园村岭脚，止于胜美尖顶，全长2.5公里，平均道宽1.5米，均为条石、卵石路。

胜美尖是位于永嘉三江梅园村后的一座美丽山峰，海拔高度约563米，原称“天顶尖”，因纪念南宋状元王十朋曾在此山妙有寺刻苦攻读而改名为“圣名尖”。1963年又因当地军民在此消灭了美蒋特务，于是改名为“胜美尖”。

胜美尖半山腰，有一道天然的石门，两块巨大

的岩石夹峙两侧，细小的山瀑垂直而下，引起一片水雾，甚是灵动。妙有寺，曾是南宋状元王十朋刻苦攻读的场所。寺前约五六十米处有一泓清泉，上方石壁上镌刻着娟秀的“妙有泉”三个连体字。寺院围墙外面有一块巨大石臼，居高临涧，表面平坦如纸。山顶的天雷岩星，犹如一对亲密相依的情侣，紧紧拥抱。登上胜美尖顶峰，站在平坦的山顶上环视四周，充分领略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壮美意境。瓯江像一幅长长的画卷浩浩荡荡从山脚缓缓铺开，三面群山起伏、云雾飘渺、争奇斗艳，美得让人不忍眨眼。

(12) 赤坑洞古道

赤坑洞古道位于鹤盛镇大缸村赤坑洞，东西走向，全长3公里，平均道宽2米，路面由卵石筑成。

大缸村赤坑洞古道，原有建于清朝道光皇帝年间（约1830年前）的妙音寺，现已倒塌。赤坑山森林茂密，四周奇峰怪石林立。中间一小溪边有一个石洞，洞中又生一个小洞。大洞面积270平方，小洞面积30平方，高15米余。离洞100米距离有奇峰，叫做龙耳朵。高约20米，宽约8米，厚约1.3米，从小溪边拔地而起，在此山阴阳两面一对龙耳朵，非常精致险要。

早在太平天国时，太平军曾在此地盘踞过。浙南游击队温州独立团总部人员，如周丕振、邱清华、伍秀清、谢发展等人，在此洞居住工作过。赤坑洞是革命的老根据地。

(13) 陶姑洞古道

陶姑洞古道，位于梅坦村的东北，起于三头洞，途经黄坦坑自然村，止于陶姑洞，东西走向，全长4公里，平均道宽0.5米，由条石、夯土筑成。

陶姑洞是梅坦村通往陶姑洞的山间小道，始建于八百年前，陶姑洞内有一座5间三层木构楼房建筑，洞顶有一泉水自上而下，是洞内的生活用水来源。洞前连绵高山，起伏不绝，很是壮观。自村内出发到陶姑洞，一路上风景秀丽，景色怡人，分别有小陶姑、悬棺、双饭礲、石笋峰、龙潭、龙滩、百丈崖。

陶姑洞不仅风景秀丽，历史色彩也极其浓郁。

相传南北朝时，陶宏景与其妹曾在此隐居。在陶姑洞的西北方向约200米处有一块悬崖，非常陡峭，要借助绳子等工具才能上去，顶峰处有一块约50平方米大小的平崖，以前也曾有人在此居住过，现上面还残留着捣臼、水槽等农用工具，但已无从考证。相传陶宏景与其妹医术高明，时常为附近的村民治病送药，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善举，将此洞取名为“陶姑洞”。

陶姑洞也是革命的摇篮，在解放前，因此地僻静怡人，敌人难以发现，中共括苍中心县委第一期青训班就在陶姑洞举行，培训期间长达一个多月，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青年干部。当时由徐寿考等带队。

(14) 乌牛纂古道

乌牛纂古道，位于乌牛西湾村乌牛纂，东西走向，全长0.8公里，平均道宽1.2米，由条石筑成，始建于东晋。

因晋代文学家、著名道士葛洪在此修炼所修建的道观，而取名“东蒙山道观”。东蒙山坐落在乌牛境内，又名乌牛纂（东蒙山）。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也在此修炼过，而这时期也是乌牛纂道观香火鼎盛期，在山上建有天然道观、餐霞洞天、胡公殿等。

乌牛纂林木森森、品类繁多，东蒙天然道观的殿宇砌造得较为精致，掩映在奇形怪状的山岩和密密簇簇的树丛中，长年被轻烟似的山岚缭绕着。

(15) 太平岭古道

太平岭古道，起于沙头镇小溪村，途经上桥、岭窟自然村，至乐清虹桥天岩村，于古庙岙处分支形成支路呈东北至西南走向乌龙川止，先南北再东西走向。古道全长11公里，平均道宽1米，最宽2米，路面由乱石筑成。

太平岭古道坐落于群山之中，是古人为方便行走往来，于地势相对较缓地段自发形成的小路。道旁设有供行人避雨休息的驿站，途中有用石块砌成的拱形石桥一座，取名“太平桥”。古道沿途群峦叠翠，

怪石峥嵘，飞瀑溪潭，景色瑰丽，形成了以太平岭、龙坑岩、龙抢珠为代表的诸多景观。从小溪村进入古道，可见石壁用繁体雕刻“太平岭”三字。

于太平岭群山之间，有一奇石，其形圆润似珠，四周岩壁平滑规整，传说有神龙常常流连此处，绕珠而戏，后人将此景命名为“龙抢珠”。唐代刘禹锡于《陋室铭》中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传说让太平岭古道多了几分神秘和韵味，使之成为集福纳祥的风水宝地。

（16）白水漈古道

白水漈古道，起于瓯北白水村，经水碓庵、白水漈口、麻山、蒲瓜尖、黄田岙、浦边，至中塘岙底，南北走向，全长10.5公里，平均道宽1.3—1.8米，路面由乱石筑成。

白水至浦边，该古道兴于晋代，作为官驿、商贾通行山道，10多公里山路至今无一段可通公路，古道周边自然风光、古韵风味犹存，其山其水天工造就，占据得天独厚的天然美景，集瀑、溪、坑、亭、庙、楼、桥等为一体，站在高处一览众山小，温州、瓯北

全景尽收眼底。沿古道而上，有甫畅亭、自清亭、平安亭、慈怀亭、三官亭、麻公亭、罗汉寺、养德楼、乌云殿、麻山禅寺等。麻山景区中心地段曾是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的据点、中心联络点，瓯北第一个村级党支部在这里诞生，是一个革命老区。

白水漈景区，王羲之、朱耸、谢灵运、杜甫、叶适、陈遇春等诸多诗人、学者留下了诗篇、传奇、对联与民间传说等，清末贡士陆菊眠后代陆崇礼曾任永嘉知县，写就《合山诗抄》（龟山蛇山古称）近400篇，白水漈周边更有《覆舟山题开口崖寺》《罗浮定居》《游水碓庵》《登华严山》《再游石门寺登最顶效谢康乐故事》等诸多诗篇。

著名散文家、诗人朱自清先生，循着谢灵运的足迹来到白水漈，并留下散文《温州踪迹》之《白水漈》，诗文刻于峭壁之上，又有原刻碑文立于之上。沿途而上，在高程50余米处有一淀水池，路旁峭壁刻有“奇古”二字，平坦之处建有“自清亭”以作纪念。

（作者单位：永嘉县地方志办公室）

蛮话的源头在哪里

——兼与《蛮话方言史》著者商榷

◇ 朱林敏

蛮话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其专业性称谓应该是浙南蛮话，包括现今的苍南蛮话、泰顺蛮讲话，以及浙闽边界的庆元、寿宁、周宁等县部分村落的蛮陞话。蛮话是一种小方言，使用人口不过五六十万人，但它是一种大方言中的小方言，它有自己的根脉与母体，有自己的源流与发展过程，当然也有特定的性质与形态，人们如何看它，是认识上的问题，它有许多问题还处在见仁见智阶段。近年来蛮话越来越受到方言学界的重视，本人作为一个“蛮话人”，对它的兴趣也越来越深，只是未能深入研究。近读《蛮话方言史》（著者杨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获益颇多，它拓展了笔者认识母语的视角与视野，让笔者对母语的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蛮话之所以引起众说纷纭，似乎跟它的特异性与神秘性分不开，其实质问题无非是它的历史渊源问题。这个问题大白于天下了，其他问题就是小菜一碟。所谓蛮话方言史，要说的自然是蛮话的“史”，著者杨勇先生在这方面下了极深的功夫，其探索精神令人钦佩。但笔者同时也感觉到著者在对蛮话史的探讨上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

全国有七大方言，蛮话当属于哪一大方言，这应该是研究蛮话历史的第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关于浙南蛮话的性质，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过一些探讨，学界后来倾向于闽语说。1988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就采取了闽语说，把苍南蛮话和泰顺蛮讲话都归属于“闽语闽东区蛮话片”。这应该是无可辩驳的定论了。《蛮话方言史》也认同闽语说。笔者认为，只要能辩证地看问题，就能看到问题的实质，就能看到现今苍南蛮话在语音上某种程度具有一些瓯语

特征，只是很表面的一些变异，其根本的闽语性质是无法忽视的。弱势方言受强势方言影响而首先在语音上趋变，这在方言接触中是很常见的现象，更何况考察苍南蛮话不能只孤立地看其现状，还必须结合泰顺蛮讲话来考察，必须看到明末清初闽南移民像楔子一般楔入苍南蛮话区和泰顺蛮讲区及闽东语区之间，将苍南蛮话区压缩于江南垞一片，令其更成为势单力孤的小方言岛，而且必须看到浙南蛮话区与闽东语区在漫长历史中的地缘关系和人文渊源关系。只有如此辩证地看问题，才能对一些外在的历史社会因素的影响加以还原考察，还其庐山真面目。这应该是判定浙南蛮话性质的必然逻辑途径。

既然认定浙南蛮话属于闽语，那么，还可以脱离蛮话的母体、脱离闽语的形成与发展这个基本人文背景和基本人文前提来孤立地探讨蛮话的历史问题吗？《蛮话方言史》似乎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偏离了方向。

在《蛮话方言史》的“前言”中，著者开宗明义地强调道：“蛮话的形式很古老，只有结合石棚墓人的汉化过程和移民史文献才可望厘清其中的纠结。”第三章的标题即是“从浙南古代石棚墓群探究蛮话的性质”。蛮话和所谓石棚墓人到底有没有关联呢？石棚墓文化现象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西亚、东亚、欧洲、澳洲、美洲都发现了三四千年前的石棚墓，而且石棚墓大多处在近海的山地中，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的是朝鲜半岛，中国境内只在辽宁、山东、浙江等地有少量发现，有学者认为石棚墓是跟古人类某种神秘行动有关的文化遗迹。据此，笔者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苍南的桐桥石棚墓现象。杨

勇先生将“桐桥石棚墓人”当作古百越土著，“石棚墓人”到底是古百越人，还是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匆匆过客？如果是古百越人，为什么他们在三千多年前留下了石棚墓遗迹，之后就没有在这里留下相关的别的遗迹呢？为什么古百越人遍布南方大地（浙闽赣粤桂滇黔等地），却只在浙南少数几个地方发现了石棚墓？这实在都还是问题。可是书中说“江南垵的原始先民古石棚墓人有其土生土长的特性”，发现了石棚墓的“平阳钱仓龙头山和苍南钱库桐桥正是蛮话人古代先民重要的栖息之地”，这些说法是不是有些武断和想当然？照这么说，临近的发现石棚墓数量更多的瑞安岱石山、棋盘山一带为什么就不是“蛮话人古代先民重要的栖息之地”？

退一步说，就算石棚墓人就是古百越人，那么古百越人的语言就是所谓的“古蛮话”吗？百越族的鼎盛期是商周时代（含春秋时期），秦汉以来由于中原政权的征伐和移民举措，百越族受到沉重打击和瓦解，逐渐走向衰弱，一些残余族群散逸于内陆深山，成为山越，后来逐渐发展为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那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应该是古越人语言的演变形态。东南沿海地区的各种方言都是汉语方言，其中浙闽地区的基本方言不外乎吴语、闽语、客家语，浙南地区的几种小方言的归属也已明确，那么其中的蛮话到底是否含有古越语成分？笔者以为，要探讨这个问题也不是在苍南江南垵这个小小范围内所能找到答案的，必须将视野拓向整个闽语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空间去，必须结合闽语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探讨蛮话的历史。既然浙南蛮话归属于闽语，毫无疑问，闽语就是蛮话的母体，脱离母体而去探讨蛮话历史，是不是有点南辕北辙？根据专家的研究，闽语的源头在河南中州，闽语是由西晋至唐末三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入闽带去晋唐时期的中州汉语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在时间上，闽语形成的关键期是西晋时期，那么蛮话的形成还会早于这个时期吗？这样说来，敢问《蛮话方言史》在探究蛮话历史的过程中，是不是在

时间和空间上都犯了观念性错误？

学界早有定论，闽语属于古代河洛语。袁家骅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一书说：“中原人民迁移入闽的过程，大概始于秦汉，盛于晋唐，而以宋为极。”西晋末年因“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导致“衣冠南渡”，其中有八姓入闽（著名的王谢诸族则迁至浙东一带），后来散布于闽南晋江流域（据说晋江便是他们因怀念故乡而命名的），他们所带去三世纪时的中原汉语，奠定了闽语的基础；唐初河南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领军（将士皆中州人）进入漳州平乱，后全军屯垦闽南（陈氏父子被奉为开漳圣王），他们带去了七世纪时的中原汉语；唐末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带兵入闽平黄巢之乱，唐亡后据闽自治，他们带去了九世纪时的中原汉语。两宋末年先后还有大量皇族入闽，不过他们的北方官话融入闽语的或许不多。这是闽语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

至于闽东语和闽北语之有别于闽南语，只在表层的语音和小部分词汇，它们的根基是一样的。不过这表层的差异，是否意味着闽东语和闽北语比闽南语略含有闽语之外的方言成分？我不知道在方言学界是否有这个问题。如果是，或许跟闽北闽东的早期开发有关。八闽大地最早得到开发的是闽北，有考古为证，又有彭祖入武夷、楚国贵族叔熊避难于闽北、欧冶子受越王之命入闽北觅地铸剑等传说，但那些都是先秦百越族内部的事。古百越族在其活动过的地盘留下了不少文明遗迹，但究竟有没有语言的遗存？北方汉族向南移民，当在秦之后，秦汉魏晋间正是百越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百越族只有西蹿，他们几无可能和汉族人混居共存（西汉时瓯越几次自请移民江淮的除外），笔者以为，瓯闽任何一个地方汉族人所到也就普及了汉语（方言），这跟闽南语的形成道理是一样的。退一步说，即使有百越语的遗韵留在东部地区，也不可能仅仅留在一个小小地盘上的一种小小方言里面，对于蛮话来说，若有这个问题，起码也要到闽东语的源头去探寻。

现在我们来看看浙南与闽东北（也就是浙南蛮话区与闽东语福宁片区）之间有着怎样的地缘关系和历史人文背景。浙南闽北这一地域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是山水相连的同一片沿海丘陵区，《山海经》就将瓯闽置于一处叙述，在漫长的历史中瓯闽是不分彼此的，商周以来虽然有闽越、瓯越两个部落分处南北两片，而在百越中，这两个部落之间关系特别亲密，民间往来更是无间如同一族（根据散布于温州和宁德地区各处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即几何印纹陶文化，这不仅有别于北方的各种文化，也有别于浙北的良渚文化，可见浙南闽东关系之密切）。春秋时期，越国为楚所灭，“越以此散，诸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史记》）。这一支越族叫于越，于越南遁于瓯越闽越之中，勾践后裔无诸和摇分别在闽瓯称王（分别都于闽北与瓯北），这里面有个诸越间的融合过程，也更说明了瓯闽之间的无间。于越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文化，但直至此时，都没出现过汉化。秦统一中国后派兵平百越，并在闽瓯之地设闽中郡，其地盘包括瓯地。无诸和摇因佐汉有功，汉初时先后又被立为闽越王和东海王（东瓯王），此时的东瓯领地包括现今浙南和闽东北一带。汉武帝时，因瓯闽间战事将东瓯之众迁于江淮之间，东瓯地即为闽越占有。后因闽越与之后的东越相继反汉，汉武帝接连大举征蛮，闽瓯政权于是灭亡。到东汉末年，东吴孙策兄弟又对瓯闽征蛮。汉政权的多次征蛮，越族几遇灭顶之灾，余民多数遁迹内陆，瓯闽之地为历次南征军队及北方流放罪人与移民所填补，遗留的少数越人也渐渐被汉化。汉昭帝时以东瓯地设回浦县，属会稽郡，领地包括今台州、温州、丽水及闽东北部分地区。这是中原王朝正式对瓯闽实行行政管辖之始（闽中设冶县）。其后直至隋唐，虽加强了对瓯闽的统治，但瓯闽间都没有明确的政区界线，民间只有自然村落的概念，而无郡县州府概念，彼此间通婚结亲商贸来往交流无限。所以闽东语的北界绝对不会跟现今的浙闽省界吻

合。浙闽省界初步形成于唐末五代时期。据闽自治的王审知在周边战乱四起之际，为保境安民，在闽周边可凭之山壑修筑了一道道关隘和一段段城墙，驻军防守，其中闽东北近海处便有分水关、叠石关等，以溪谷为守的如原长溪县（今福鼎、柘荣、福安、寿宁等县）和原平阳县西南部（今泰顺）之间的一段。到元代实行行省制度时，浙闽界线进一步明确了下来。而在王审知治闽时期，闽语已经定型，就是说，作为闽东语一个支系的蛮话，是在现今的苍南泰顺一带扎下根后，行政区界再将这一带划入浙江境内的。

《蛮话方言史》虽然强调“从历史与地理的角度进行动态的层次研究”，惜其终未找到正确的“历史与地理的角度”。

浙南蛮话作为闽东语的一个支系，和整个闽语一样，它本身就有相当深厚的古汉语成分（含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中），这是从母体直接脱胎出来的，而不是它成为蛮话以后，蛮话人受到“自北向南的汉化”而从流落当地的北方移民的口中吸收一点来的。因为其源头就是河洛语，就是晋唐时期的中原汉语。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明末清初闽南移民迁入之前，苍南蛮话区和泰顺蛮讲话区是连片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原土著人不可能留下那一片空地虚位以待闽南移民的，这里面有一个蛮话区（在原平阳县境内）东挪北移的问题。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看到，平阳县西部南部和苍南县西部南部的闽南话区若是撤掉，蛮话区将复位于它的祖籍地，这样一复位，它不仅同泰顺蛮讲区连成了一片，也同闽东语区连成了一片。以此推断，起码在唐宋之前尤其是闽语形成定型期的晋唐间，江南洋一带未必是蛮话人的地盘，这一带跟蛮话的形成更无必然联系。

问题已经很清楚，浙南蛮话的源头在南向，浙南蛮话的母亲是闽语。至于闽语究竟是在闽南、闽东、闽北同步形成，还是由闽南逐渐向闽东、闽北蔓延与流播而渐次形成，这问题应向方家要答案了。

（作者单位：泰顺县地方志办公室）